

马新独立运动：傅树介与反殖斗争

**The Independent Movement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Poh Soo Kai and Anti-
colonial Struggle**

伍雪仪

NG SUET YEE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RCH 2014

马新独立运动：傅树介与反殖斗争
**The Independent Movement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Poh Soo Kai and Anti-
colonial Struggle**

By

伍雪仪

NG SUET YEE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MARCH 2014**

摘要

2000 年以前出版的马新历史书籍，鲜少提及傅树介，或将傅树介边缘化，导致世人对傅树介一名甚感陌生。因此，本文将从傅树介的童年叙述至老年（到 2013 年），以求全面展露出傅树介的理想、政治历程等，尽可能为现有历史作出补充。

本文在绪论部分，先清晰简要地叙述傅树介的简介，后再以前人对马来亚政治人物的研究概况作为本文的文献综述，并说明笔者对本文的研究动机与方法。在第一章，笔者尝试叙述傅树介的诞生与其在新加坡沦陷前，如何与家人逃往至印度，并在孟买的天主教中学求学的生活。其后，笔者还会简述傅树介返回新加坡之后的生活与活动。

第二章，着重论述傅树介在大学时代的学生生涯与其贡献。笔者先叙述傅树介与友人共同创立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创办会刊《华惹》。后再由此延伸至《华惹》煽动案件，从中述说傅树介在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和会刊《华惹》之间的贡献、傅树介与李光耀的相识和接触、《华惹》煽动案件的影响力等。

第三章和第四章则讲述傅树介的政治生涯，说明其与林德宪制、人民行动党、社会主义阵线和合并白皮书之联系，后再通过这一层层关系来揭露傅树介等人与李光耀的对抗，但最终却以“冷藏行动”结束傅树介等人的政治生涯。随之，笔者也会在本文讲述傅树介在狱中的生活与释放后的生活来结束傅树介的一生。

最后，笔者在总结处，将透过傅树介的时代背景、学生生涯与政治生涯的论述，探讨其思想、历史意义、贡献、个人特质等。

关键词：傅树介 李光耀 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 《华惹》
社会主义阵线

ABSTRACT

The Malaysia and Singapore history books published before 2000 presented Mr. Poh Soo Kai as a stranger and a person with no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He was rarely mentioned, or when his name appeared, he was always marginalized. Mr. Poh Soo Kai's life, from childhood till seniority (until 2013), and his involvement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British colonialism, will be narrated in this thesi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amine Poh Soo Ka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ction, in hope that his role in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could be fairly assessed.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Mr. Poh Soo Kai will be repor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thesis. Research works on Malayan politicians are presented; a literature review will show the general finding of their research. In the first chapter, Mr. Poh Soo Kai's early life, his moving out of Singapore to India just before the fall of Singapore and his life when he was studying in a Catholic missionary secondary school in Bombay will be briefly narrated. Then, Mr. Poh Soo Kai's activities after he moved back to Singapore will be presented.

Second chapter focuses mainly on his university life and the contribu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Fajar by Mr. Poh Soo Kai with his friends and following by the Fajar Trial will be narrated.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contributions by Mr. Poh Soo Kai between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Fajar will be examined, followed by Mr. Poh Soo Kai's encounter with Mr. Lee Kuan Yew. Last but not least, the powerful impact of the Fajar trial on Poh will be also reported.

Chapter three and four are focus on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Mr. Poh Soo Kai. There is a discussion on Mr. Poh Soo Kai and the Rendel Constitution, People's Action Party, Barisan Sosialis and the White Paper on merger. Then after delving through all of these backgrounds, an exposition of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Mr. Poh Soo Kai and his comrades with Mr. Lee Kuan Yew is presented. Poh's political career ended with the Operation Cold Store, and his life in prison and the life after his released will sum up this chapter.

In conclusion, this thesis explores Mr. Poh Soo Kai's political thoughts, his role in Singapore's history, his contributions and personal qualities.

Keywords: Poh Soo Kai Lee Kuan Yew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Fajar Barisan Sosialis

谢词

经过一番努力，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终在 2013 年完成，但这一艰巨任务的完成，并非个人才能所及，而是有赖于身边师长、家人在笔者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期间所给予的教导、协助与鼓励等等，使笔者感激万分。

首先，衷心感谢论文指导老师，何启良老师的悉心引导，也非常感谢他牺牲自己的个人时间，在百忙之中抽空查阅与批改笔者的论文，并在论文处给予评语、提问、意见等。另，当笔者无法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查找到《华惹》会刊时，何老师依然亲切地从旁给予指点。从确立论文的题目直至论文的完成，皆得何老师亲切且不辞劳苦的悉心指导。再者，亦非常感谢张晓威老师对笔者的指导与提点。

其次，感谢 Juliet 的帮忙，使我有机会能够亲访傅树介本人。另，也非常感谢傅树介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其宝贵的时间，与笔者分享其自身的经历，实是万分感激。再者，感谢母亲对笔者的关心与鼓励。在笔者撰写论文期间，母亲都会关心笔者撰写论文的进度与身体的健康。除此之外，母亲还会在笔者陷入困境或瓶颈时，给予“加油”声和陪伴笔者谈天说地，使笔者从垂头丧气中解脱，再次以欢乐的心情撰写之。

最后，感谢姐姐和姐夫的支持，让笔者毫无忧虑地完成此论文和硕士课程。与此同时，笔者也非常感谢姐姐的劳苦奔波，陪伴着笔者到新加坡查找资料。对于这种种的教导、协助、鼓励、支持等，笔者永记于心。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马新独立运动：傅树介与反殖斗争为伍雪仪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何启良教授）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教授

日期：_____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 27.03.2014

硕士论文提交

此证伍雪仪 (学号: 11ULM00703) 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何启良教授指导下, 经已完成此一题为马新独立运动: 傅树介与反殖斗争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pdf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 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伍雪仪)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伍雪仪

日期：27.03.2014

目录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v
谢词	vi
论文核实书	vii
硕士论文提交	viii
论文声明	ix
绪论	1
第一节 文献综述	5
第二节 研究动机	9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1
第一章 时代背景：英治与日治时期.....	13
第一节 傅树介的诞生与家族关系	13
第二节 童年期的逃亡	14
第三节 重返新加坡	17
第二章 打破沉默：走向社会主义.....	19
第一节 创立政治俱乐部	19
第二节 创办《华惹》编辑部	22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扩展	25

第三章	扩展政治圈子：从“林德宪制”到“合并白皮书”	28
第一节	林德宪制下的傅树介与李光耀	29
第二节	筹组另一股势力——社会主义阵线	32
第三节	合并白皮书之争议	36
第四章	坚定不屈：宁为坐牢，不为苟同	42
第一节	二·二大逮捕	42
第二节	铁窗生活	45
第三节	重获自由身	54
结语	56
参考书目	60
附录	66
 <u>附图</u>		
图一：	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党徽	66

绪论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¹是一个迈向合并与独立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根据历史记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军重返马新，恢复对马新的殖民统治，但马新人民反对之，纷纷提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民主等要求，以期摆脱英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在这样的趋势下，英殖民当局意识到此时的马新已非彼时的马新，无法再以战前的方式来维持其殖民统治，所以英殖民当局为了维护其自身的权益，退而求其次，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即一方面实行缓兵之计，对人民的要求作出让步，如实行宪政改革、还政予民、给予自治权等；另一方面则是施加高压政策，以镇压马新人民的反抗斗争或一系列的反殖运动，如实施“紧急法令”²（Emergency Regulations

¹ 此后，举凡提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皆通称马新。

² 1948 年，马来亚共产党决定向英殖民统治者展开武装斗争，进行游击战，以夺取政权。因此，英殖民统治者为了应付这场游击战争，特颁布“1948 年紧急条例法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即所谓的“紧急法令”。据《马来亚风云七十年》一书所述，“紧急法令”的基本内容为“任何警官或在警长官阶以上者，或由其授权之各色人等，均可命令、指挥、管制、限制、禁止使用陆路或水道；任何警官或在警长官阶以上者，或由其授权之各色人等，均可命令、指挥、管制、限制、禁止任何人乘坐火车、公共汽车或任何车辆，或船只之往来；五人或五人以上之集会或聚会，无论在什么地方均可由任何警官或在军曹官阶以上者下令驱散；任何人张贴或散布任何标语、通告或文件，以鼓动暴行，或劝诱不遵法令或合法命令，而招致或可能引起破坏治安，即为犯罪；警察总监或警察区长官可下令禁止印刷、出卖、发行或销售有煽动倾向或鼓动暴乱，不服从法律而有可能引起破坏治安之刊物或文件；辅政司可下令扣留任何人，并将其禁锢不逾一年的时期；任何警官或在副警长官阶以上者，可无拘票或助手进入及搜查任何屋宇，停止及搜捕任何车辆或个人，不论是否在公共地方若其怀疑该屋宇或个人，或车辆藏有犯法之证据，在发现任何证据时，可将之没收；任何警官或在伍长官阶以上者，可不必有拘票拘捕任何有违犯本条例行动之人。”（南岛丛书编辑委员会，2000：345）简言之，“紧急法令”就是进行逮捕、监禁；禁止聚会、言论自由；压制出版物等。直至 1960 年 7 月 31 日，正式废除“紧急法令”。

Ordinance 1948) 与“内安法令”³ (Internal Security Act, 简称 ISA)。

然而，这一切政策，皆无法满足或阻止马新人民争取独立、民主、摆脱英殖民统治等夙愿。因此，马新人民仍继续在各个领域，如学运、工运或其它行业进行一波又一波的反殖、反帝与宣扬社会主义运动等，也从而诞生出一批极为英勇，且不畏强权的反殖之士，犹如陈平、陈祯禄、林苍佑、林清祥、方水双、傅树介、林福寿等，而傅树介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不但在政治、法庭和扣留营里与一批英殖民统治者和恶势力进行艰苦的斗争，甚至还付出其自身的自由、青春岁月等。如此一位勇于反抗，不惜牺牲的人物，即为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

“傅树介”一名曾刊登或出现于报章与书籍中，且写法各异，有的写作傅树介，有的写作傅树楷或傅思开，但据傅树介本人所述，“惟有前者的写法为其本名，后两者皆是译名”（傅树介，2012年2月8日）。因此，本文将取傅树介一名为准。傅树介在1932年出生于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沦陷前与其家人逃至印度（India），在孟买（Bombay）的天主教中学求学。迨至日本投降后，傅树介才得以与其家人搬回新加坡居住，且先后入读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和新加坡马来亚大学⁴（University of Malaya）医学院。

³ “内安法令”实是“紧急法令”之延续。它在“紧急法令”废除后的第二天，即1960年8月1日，正式生效。其目的是为了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颠覆活动，且拥有着最大的权限，即“不必在公开法庭证明某人无罪，就可以长期扣留。首先，可扣留60天，以‘协助调查’。接着，在内政部长命令下，可扣留两年，而这两年的扣留期限可无限期地‘更新’或延续下去”（辜瑞荣，1999：ix）。

⁴ 本文乃以新加坡马来亚大学为主。此后举凡提及马来亚大学，皆指新加坡马来亚大学，不再标明“新加坡”三字。

在马来亚大学医学院求学期间，傅树介与一批医科和文科生携手创立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简称 USC），出版俱乐部会刊——《华惹》（Fajar）。约一年后，傅树介与其他《华惹》编辑部的七位成员：拉惹古玛（M. K. Rajakumar）、Lam Kuan Kit、Edward Thambu、P. Arudsothy、Kua Boo Sun、Thomas Varkey、詹姆斯·普都遮里（J. J. Puthucheary），因在《华惹》刊登了一篇题为〈对亚洲的侵略〉（AGGRESSION IN ASIA），而被控以煽动罪。为此，傅树介等人邀英国女皇律师毕礼特（D. N. Pritt）和李光耀担任这宗煽动案的辩护律师和助理律师。历经一番审讯后，他们打赢了这场官司，亦宣布八人无罪释放，撤销控状。

1957 年，傅树介从马来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不似兀哈尔（S. Woodhull）、詹姆斯·普都遮里等人，直接任职于工会，而是先进入政府医院部门服务，在杨锦成的手下担任一名外科手术受训医生，后再成为竹脚妇科医院（Kandang Kerbau Maternity Hospital）的妇产科受训医生。1959 年，傅树介协助斯里尼瓦森（B. R. Sreenivasan）创立新加坡医药协会（Singapore Medical Association，简称 SMA），并成为该协会的首届秘书（1959 年-1961 年）。1961 年，傅树介与林福寿一同辞去政府部门的工作，与其他政治和工会领袖组织社会主义阵线⁵（Barisan Sosialis，简称 BS）。最终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正式宣布成立，傅树介也因此而担任助理秘书长一职。同年，傅树介亦与林福寿一起在 Balestier Road 设立药房，取名为人民药房（Rakyat Clinic）。

⁵ 本文乃以成立于新加坡的社会主义阵线为主。此后举凡提及社会主义阵线，皆指新加坡的社会主义阵线，不再赘注。

1963年2月2日，傅树介、林清祥、林福寿与逾百名的反对党、工会与其它社团组织的主要成员，在一场被名为“冷藏行动”的大逮捕行动中，被内部安全委员会逮捕和扣留，大肆镇压了马共、左派及反殖的力量。在这场大逮捕中，傅树介没经任何审讯就直接被扣留。扣留了几年后，傅树介被告知释放的好消息，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是有条件的。释放条件就是傅树介必须与左派脱离关系，并谴责左派。傅树介不妥协，仅说他会谴责没有害过他的人或政党，而且自逮捕的那天起，他已没有缴交党费给社会主义阵线，已不再是社会主义阵线的党员。最终，此回答不被接纳，因此傅树介继续在牢房里耗费殆尽其自身的青春年华与宝贵的时间，直至1973年12月13日才被释放。两年余，即1976年6月4日，傅树介再度被捕入狱，后在1982年8月26日释放。获释后，傅树介开设一间私人诊所，直至1990年，傅树介才移居到加拿大（Canada）生活。

从傅树介的生涯来看，无论是前期与友人创立“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或后期与友人创立“社会主义阵线”，皆毫无掩饰地标志着傅树介由始至终所追求的东西，即社会主义。何谓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因此，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不允许犯有狭隘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错误”（林钦，1960），主张公有制、平等、民主等。相反的，英殖民政府统治下的马新，则是一个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主张私有制，且拥有专制的政治形式和剥削、掠夺的制度。显而易见，社会主义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全然不同，因此在两者相较之下，傅树介与当时的马新人民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皆勇敢

地站到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因为他们深信社会主义能够改善他们现有的生活环境，为他们带来一个平等、民主、天下为公的社会，没有所谓的资产阶级之分，整个国家的资源与财富，皆由整个国家的人民共同生产、共同分享、共同拥有等，完全不存在任何的私有制与剥削或压迫。简言之，社会主义在当时的马新有着流行的趋势，为马新人民所向往，同时对傅树介而言，亦是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政治理想，乃至牺牲其自身的自由与宝贵的青春也在所不惜。

第一节 文献综述

有关马来亚人物研究，大可分之为三大类，即政治、儒商与文化。然而，本文所要研究或论述的人物，是傅树介，属政治界人物，所以笔者仅叙述有关政治人物的文献，而有关儒商和文化的人物，恕不赘述。据现今对马来亚政治人物的研究，尚未发现有任何学者探讨傅树介。就中文著述而言，记有叶亚来（1837年-1885年）、陈祯禄（1883年-1960年）、陈修信（1916年-1988年）、林苍佑（1919年-2010年）、林吉祥（1941年-）、林清祥（1933年-1996年）、李光耀（1923年-）等人。

首先，对于叶亚来的研究，学者们叙述了其生平简介、产业、对吉隆坡开埠的贡献、移民动机、南来之后的奋斗史、在帮会斗争里的崛起历程与历史地位或历史评价等，犹如陈亚才主编的《在吉隆坡，遇见叶亚来》、李业霖主编的《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收入于何启良主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匡政与流变》之黄贤强著作——〈叶亚来：从平凡移民到不平凡领袖〉、收

入于《马来西亚华人创业传》之刘崇汉著作——〈吉隆坡的开发和设计者叶亚来〉。其次，对于陈祯禄的研究，学者们则在文献上提出陈祯禄对中华文化与华文教育的认识与态度取向、对政治和社会课题的策略与思路、形成其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中西学说、历史意义、贡献等，如郭仁德著《敦陈祯禄传》、王琛发编的《为万世开太平：陈祯禄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收入于何启良主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匡政与流变》之郑良树著作——〈陈祯禄：学者型的政治家〉。对于陈修信的研究，学者论述了在陈修信时期的马华公会与华文教育、家庭背景、成长历程、贡献与局限、历史评价，并从而分析陈修信在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史上的地位和定位等，如收入于何启良主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匡政与流变》之何启良著作——〈陈修信：贡献与局限〉。另，对于林苍佑的研究，学者们则记述了林苍佑的童年与其学生时代、迈上漫长政治的旅程、在独立前后马来亚政坛上的崛起、如何赢得“槟州发展之父”的称号、如何领导民联党和民政党的论述、在政坛上的地位等，犹如谢诗坚著《林苍佑评传》、收入于何启良主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匡政与流变》之林水椽著作——〈林苍佑：几度升沈的悲情人物〉。对于林吉祥的研究，学者们分析了林吉祥参加政治反对运动而又坚持固守岗位的信念与动机、生平简介、成长历程、政治历程等，如黄基明著《铿锵吉祥》、收入于何启良主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政治篇——匡政与流变》之祝家华著作——〈林吉祥：政治反对先驱者〉。再者，对于林清祥的研究，学者论述了林清祥的崛起、与民族主义文化和国际主义的联系、政治风格与历程

等，如哈珀（T. N. Harper）著《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最后，对于李光耀的研究，学者们探析了李光耀的儒家价值观、治国之道或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思想、背景经历、领导模式等，如吕元礼著〈探析李光耀的儒家价值观〉、曹廷清著〈浅论李光耀的治国思想〉、李伟钦著《李光耀民主社会主义的形成与消失》、蔡纯真著《政治领导与政治继承——李光耀个案研究》、张永昌著《领导行为理论与实践——新加坡李光耀领导行为之个案研究》。

除中文著作外，英文著作也同样进行了马来亚政治人物研究，但亦未见学者探讨有关傅树介的任何著述。其探讨的人物有拉惹古玛（1932年-2008年）、詹姆斯·普都遮里（1923年-2000年）、林清祥（1933年-1996年）等。有关拉惹古玛的研究，学者们叙述了拉惹古玛与家人在日治时代的生活、从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到社会主义阵线的经历、如何加入政界、政治后的生涯等，犹如陈碧玲主编的《不熟悉的英雄》（An Uncommon Hero: M. K. Rajakumar in Politics and Medicine）、Professor Dr. Jomo Kwame Sundaram 写的一篇文章——Dr MK Rajakumar, Another Unsung Hero Of The Nation Has Passed On。另，有关詹姆斯·普都遮里的研究，学者们论述了詹姆斯·普都遮里与朋友一起奋战的种种时光和经历、在政治与监狱期间的诗作等，如多米尼·普都遮里（Dominic J. Puthuchery）与 Jomo Kwame Sundaram 合编的 No Cowardly Past: James J. Puthuchery Writings, Poems, Commentaries。最后，有关林清祥的研究，学者们分析了林清祥所扮演的角色、在新加坡史上的地位、政治生涯等，

如陈仁贵与 Jomo Kwame Sundaram 合编的《林清祥与他的时代》（Comet in Our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

根据上述学者对马来亚政治人物的一个研究概况而言，多分析出政治人物在政治上的崛起历程、历史意义、贡献、局限、思想、所扮演的角色等，皆是作为探讨一位政治人物所不可或缺，且极其重要的论述。假若在探讨一位政治人物时，不加以论述其在历史上的意义、崛起历程、贡献与局限等，这还可算是一个政治人物的研究吗？显然是不可以构成一个政治人物的研究，因为其已经失去研究政治人物的意义所在。简言之，一个政治人物的研究不能只限于传记式的描写，需跨越之，进而分析与探讨其个人的魅力所在、思想与历史意义等。

至于一些有关马新反殖斗争的著述，有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出版的《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年-1972年）》；赛·扎哈利（Syed Husin Ali）著的《人间正道——赛·扎哈利政治回忆录》（Meniti Lautan Gelora: Sebuah Memoir Politik）、《万千梦魇——赛·扎哈利政治回忆录 II》（Dalam Ribuan Mimpi Gelisah: Memoir）；丁艾薇著的《集体记忆与官方历史：论新加坡独立前的学生运动》；哈珀著的《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陈碧玲主编的《不熟悉的英雄》；方壮璧著的《“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回忆录》；柯林·亚伯拉罕（Collin Abraham）著的《改变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关键时刻：透视合艾和平协议》；傅树介、陈仁贵、许赓猷编的《〈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等。这些著述，均以学

生运动、政党、回忆录、人物研究等方式来论述或揭露出马新反殖斗争的种种事迹。

第二节 研究动机

历史本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有系统地记录着人类社会、斗争、自然界或是个人经历，为现代人提供过去事实的记载，使现代人理解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但世事难料，原是客观记录事实的历史竟会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有所改变，使其有意识地让历史发展得更为完善，而歪曲或捏造历史，导致历史有所偏移，脱离了历史该有的存在意义。1950、60年代新加坡“独立建国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早年有关新加坡的历史书籍，仅强调好的一面，而将丑陋的一面掩盖起来，甚至还当时的风云事件或风云人物一笔带过，试图将其边缘化，抹去历史原有的本来面目。

俗语说：“纸是包不住火的，瞒过初一也瞒不过十五”，被篡改的历史也不可能永远维持现状，也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被遗忘、掩盖、抹煞掉的人或事也不可能永远沉睡，也会有被挖掘的一天。近年内，市面上陆陆续续出现有关1950、60年代新加坡“独立建国史”的书籍，如《白色风暴——新加坡的新仇旧怨》、《〈华惹〉风云与后李光耀时代》、《不熟悉的英雄》、《〈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No Cowardly Past: James J. Puthuchearry Writings, Poems, Commentaries 等。这一系列的历史著述与昔日的历史著述，可用“天渊之别”形容，因为这一系列书籍都记载着历史真实的一

面与被遗忘、掩盖、抹煞掉的人或事，从而将历史还原，并作出应有的纠正与补充，而这种种修改与补充都是经过作者自身的回忆与英国国家档案局里所挖掘的历史资料编写。

经过众多作者的努力和细心纠正与补充后，傅树介一名纷纷涌现，也因此而渐渐留下痕迹，使读者得知傅树介在学生时期，曾领导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员和《华惹》编辑部的成员反殖民主义、追求民主、社会正义等，并借由《华惹》将反殖思想传达于世人。最终，因《华惹》案件的发生，而成功将其思想传世，使“亚洲人不再苟安或屈服于外来统治”（Jeyaraj Rajarao, 2010）、“马来亚和新加坡领袖更积极地增强活动，以从英国手中夺取自由”（Jeyaraj Rajarao, 2010）等。除此之外，傅树介还与林清祥等人共同创办社会主义阵线，推动反对合并条件的计划，但计划还未成功，就宣告失败。

就上述而言，傅树介拥有着领导者与推动者的双重身份，而且还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对于如此的一个人物，笔者觉得有其研究价值，不应埋没于历史洪流之中。傅树介虽然不似林清祥般受人注目，但也不会因此而降低他的研究价值，因为傅树介受的是英文教育⁶，而林清祥受的是华文教育⁷，加之两者的成长背景有异，所以不宜将二人相提并论。然而，

⁶ 自马新落入英人手中，并得到广泛的司法管辖权后，就在马来亚的一些主要城市创立一系列大学预科学校，而英语则是这些学校的媒介语。在课程方面，主要是源自英国学校的课程，但也会不时根据马来亚当地的情况加以修订，如删除有关反殖战斗的口号和情绪。另，英校的制度“原是学生读小学六年就要参加会考以进入为期四年的中学，然后再参加剑桥学校文凭考试，即相等于英国 O 水准考试。后来中学教育延长多两年至高级学校文凭考试，即相等于英国的 A 水准文凭考试。这是英校的 6-4-2 制。”（Tan, Poh, & Koh, 2010）

⁷ 英人基本上都不理会华文教育，只让各自的族群负责。因此，他们只好模仿中国的学校模式来办理中小学，而且由各自的宗乡团体或其它慈善机构管理和赞助。在课程方面，是以中国为基础，教员也大多数邀自中国。华校制度是学生要读六年的小学、三年的初中和三年的高中，即 6-3-3 制。

笔者在众多身受英文教育的人物当中，选择傅树介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他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充分代表着一班身受英文教育的反殖志士，并被誉为“身心奉献的激进主义先锋”（Jeyaraj Rajarao, 2010）。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撰写论文前，笔者会先通过马新史书的记载，以了解傅树介所身处的时代背景，掌握期间所发生的事件或事情。同时，亦会通过《〈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林清祥与他的时代》、《〈华惹〉风云与后李光耀时代》、《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等书籍掌握傅树介等人一起创办的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华惹》、社会主义阵线、“冷藏行动”等背景资料，以作论述之用。除了一些书籍上的资料外，笔者还会利用网络的发达，试图查寻傅树介在近期内的演讲文稿。再者，为了丰富与充实本文中的资料，还会查找一些较为早期的报章（1950年代-60年代），犹如《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等。对于这些较为早期的报章，无法在华社研究中心（华研）查找，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图书馆查找相关报章。另，还会到马来西亚档案局查找有关独立运动的事情。

除了一些史事、政党等资料外，亦可从傅树介身边的人物着手，如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拉惹古玛、詹姆斯·普都遮里、林福寿等；社会主义阵线的林清祥；《华惹》煽动案件的助理律师、人民行动党

(People's Action Party, 简称 PAP) 的李光耀, 以借此获取与傅树介相关的资料。再者, 笔者也会查找傅树介当年在成立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时所创办的《华惹》刊物和与傅树介做个访谈, 试图从中获取更多的资料。

简言之, 笔者就是通过文献分析法, 将刊载于书籍、报刊、网络的材料, 再结合田野调查及口述历史的方法下, 进行考证和分析, 以求能够达到文献资料互补和充实本论文的内容。

第一章 时代背景：英治与日治时期

傅树介从诞生到其童年，完全沉浸于英治与日治时期。在这十余年的生涯里，傅树介可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目睹了种种的凄惨、不幸、伤亡之况等。然而，这种种经历或目睹之况，毫无疑问地也烙印在傅树介的记忆里。

第一节 傅树介的诞生与家族关系

傅树介在 1932 年，即新加坡弥漫着浓厚的政治气氛与人民怀有新颖思想观念的期间，诞生于新加坡的一户富裕家庭，在家中排行第四，共有一位哥哥、两位姐姐、一位弟弟和一位妹妹，祖籍福建。父亲名为 Poh Teng Kok，是一名商人，母亲则名为陈蕙（陈爱蕙），是一名家庭主妇。除此之外，傅树介还有一位大姨丈，名为李光前，是著名的慈善家和华侨银行（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简称 OCBC）的创始人。

以上述的联系和傅树介对李光前的称呼而言，可以确信李光前就是傅树介母亲的姐夫。换言之，李光前的妻子就是傅树介母亲的姐姐，也就是陈嘉庚的长女，陈爱礼。就此情况而言，傅树介之母陈蕙，又是陈嘉庚的第几个女儿呢？傅树介和陈嘉庚到底有些什么联系呢？

根据历史记载，陈嘉庚在 1893 年奉母之命回乡完婚，娶板桥乡浒井社秀才张建壬之女张宝果为正室，后再娶吴惜娘、叶氏和周氏为妾，共生有九子八女：长子陈厥福（又名陈济民）、次子陈厥祥、三子陈博爱、

四子陈博济、五子陈国庆、六子陈元凯、七子陈元济、八子陈国怀、九子陈元翼；长女陈爱礼、次女陈来好、三女陈蕙（陈爱蕙）、四女陈妹（陈秀满）、五女陈柿（陈亚柿）、六女陈爱珠、七女陈宝治（弟）、八女陈爱英。（陈碧笙、陈毅明，1986：15、96、168；刘惠生，2010）显而易见，傅树介之母陈蕙，就是陈嘉庚的三女儿。就此推论，傅树介就是陈嘉庚的外孙，拥有着血缘上的联系。

在访谈之时，傅树介也确实地述说其自身是陈嘉庚的外孙，但却没有很深的接触，因为他们不同处于一个屋檐下，加之当时的陈嘉庚也正忙于政事、教育、筹募等活动，几乎日夜吃住都在怡和轩俱乐部，所以傅树介能够与陈嘉庚接触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就仅能够在传统节日时，见上一面。再者，傅树介虽贵为陈嘉庚的外孙，但他却不卖弄自己的身份，鲜少以“大名鼎鼎的陈嘉庚的外孙名义自居。”（张泰永，2010：73）

第二节 童年期的逃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日本采取各种经济制裁措施，如禁运石油、冻结日本在美基金等，导致日本的资金和材料输入陷入困境，最终逼迫“日本为了寻求石油、橡胶、铁矾土等资源，企图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名义下，对东南亚进行侵略”（依田熹家，1995：345）。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带来重大损失。同年12月8日，日军开始对“南方”展开全面攻击，侵略马来亚、菲律宾、香港、缅甸、印度尼西亚等

地区，以“覆灭东亚的美国、英国、荷兰的主要根据地，确保占领南方的重要地区”（冯玮，2008：589）为目标。

在山下奉文（Tomoyuki Yamashita）指挥下，日军分别从泰国南部北大年、宋卡和马来半岛北部哥打峇鲁强行登陆，并派数十架轰炸机摧毁新加坡丁加和实果两个军用机场，炸沉英军两艘主力舰“威尔斯太子号”（Prince of Wales）和“击退号”（Repulse），轰炸新加坡市区，使英军失去制空权和制海权，同时也造成平民伤亡。面对这战乱时期，人民毫不退缩，依然勇往直前，保家卫国，正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侨团大会，成立星华救济会，负责救护与其它工作；新加坡各行会（货仓工友会、米业运输工友互助社、石业工人联合会、码头工友互助会、华人司机互助会等）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各阶层立刻动起来，团结抗日，并成立工人抗日后备队，助英军一臂之力。

随着日军进攻，新加坡日益危急，促使新加坡总督申顿·汤姆斯（Shenton Thomas）寻求陈嘉庚的协助，“请陈嘉庚出马召开新加坡华侨总动员会，动员组织华侨投入抗敌救亡工作”（陈天绶、蔡春龙，2005：270）。1941年12月30日，在陈嘉庚主持下，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由陈嘉庚担任主席一职，下还设有总务部、劳工服务部、保卫团部、民众武装部和宣传部，分别负责防空救护、维持治安、搬运军用物资、修建等工作。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成立后，新加坡华侨抗日义勇军（简称星马义勇军）也随之成立，由英国人达利（J. D. Dalley）担任司令，共有八个连队，负责与日军战斗。经过种种抵抗与搏斗，新加坡依然无法与日军匹敌，终于1942年2月15日，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白思

华（Arthur Percival）代表英军与山下奉文签署投降书，无条件将新加坡奉送给日本，后改名为“昭南岛”（Syonan-to）。

傅树介亲身经历了这场新日战争，目睹日军侵略新加坡的情景。依战争爆发时间推算，当时的傅树介仅是一位年近 10 岁的孩童，无法做出任何抵抗或贡献一己之力，仅能默默地目睹一切，深埋于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傅树介犹记得新加坡沦陷前一个星期，其与外婆、阿姨、母亲、兄弟姐妹们乘坐法国大船逃离新加坡，但这并不是傅树介第一次逃离新加坡。（傅树介，2012 年 2 月 8 日）在此之前，傅树介本是乘坐大约 12 吨小船逃离新加坡，后因日军来袭，道路封闭，导致一些亲属无法前来，所以傅树介的外婆决定不搭乘这班小船离开新加坡，傅树介等人也只好遵从之，返回家中。（傅树介，2012 年 2 月 8 日）当时谁也没料到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来得如此重要，竟能够取决他们的生与死。就在事后，他们接到那艘小船被击沉的消息，深切地感悟到自己是多么幸运。

逃离新加坡，平安抵达印度后，傅树介开始了另一段童年生涯。在印度期间，傅树介的童年生活与一般孩童一样，皆不外乎两样东西，即学习与玩耍。在学习方面，傅树介就读于孟买的天主教中学，从中学习了三种语言：第一种是主要语言，英语；第二种是当地语言，印地语（Hindi）；第三种是基于法国天主教中学而学习的国语，法语。在玩耍方面，傅树介会玩打弹珠或放风筝等游戏，以增添童年的乐趣与色彩。至此，傅树介这段看似平凡却又不平凡的童年生涯划上了句点。

第三节 重返新加坡

日本统治新加坡期间，“华侨不顾种种艰难困苦，勇敢地开展武装斗争，积极配合盟军的反攻，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自由和解放，为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林远辉、张应龙，2008：466），终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撤出新加坡，重新恢复英国的殖民统治。日本的投降，为当时因战争而逼迫逃离新加坡的人们带来重返家乡或家园的机会。傅树介与其亲属亦因此重返新加坡，重新开始新加坡生活。

重返新加坡后，傅树介进入新加坡第一间英校，莱佛士书院求学。莱佛士书院是史丹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于1823年创办，目的在于“教育当地高层人民的子弟；为有需要的东印度公司雇员提供学习当地语言的途径；收集散落在各处的当地文献和传统的资料，以便了解当地的法律和习俗，目的在于帮助当地人”（李光耀，1998：34），实则是进行殖民化教育。课程会根据新加坡的情况加以修订，以试图压制学生的思想和学生对政治的觉悟与认识，借此制造驯良服从的学生和人民，巩固殖民地的统治，但却无法如愿，反逐渐激发人民的觉醒，不断增强人民对反帝、反殖的斗争精神，推进新民主教育，特别是在光复之后，更为应验了“物极必反”的道理。傅树介也就在此状况下，入读莱佛士书院。

傅树介就读于莱佛士书院，身受殖民化教育，是必然且无法改变的事实，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傅树介是否受到殖民化教育的影响，而归顺之。有关傅树介是否被殖民化的论述，无法在此，即毫无论证下进

行任何独断的言论或评论，需视其日后的言行举止，乃至其思想，再进而探讨。因此，对于傅树介是否被殖民化的相关论述，将于另一些章节论及。

1950年，傅树介进入爱德华七世医学院（the King Edward VII College of Medicine）与莱佛士书院合并成学位授予的大学——马来亚大学医学院求学。据傅树介、陈仁贵、许赓猷在《〈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绪言中提到，“英校的中学生多数都只限于阅读英文课本与文学作品，但进入了大学，这群英校生有了更为广泛的阅读空间，得以在学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阅读马克思（Marx）、列宁（Lenin）、哈洛德·雷斯基（Harold Laski）、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等政治理论家的英文书籍，从而影响他们的思想。”（Tan, Poh, & Koh, 2010）可见，傅树介在大学求学期间，渐渐接触到有关政治的英文书籍，开始对政治有更深一层的意识。当这些政治意识经过岁月流逝，逐渐累积，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致使傅树介无法再安于现状，进而开展其政治生涯，从此远离平淡且安定的生活，延续其不平凡的人生。

第二章 打破沉默：走向社会主义

在马来亚大学医学院求学期间，傅树介不断被教导有关医学上的知识，加深其对病症或药物的了解。修读期间，傅树介还曾目睹脚气病（beriberi）患者，且被教导以维生素为这类患者进行治疗。对于此疗法，不禁引发傅树介深思到：“维生素就像抗生素一样，是一种治疗脚气病的药物。那么这药物是否应被视作或归类为食物的一种，而食物的缺乏就是其病因呢？自我将维生素视为食物后，就延伸出其它问题，犹如为什么粮食会短缺、为什么会有贫穷问题？”（Poh, 2010a）。这一个又一个像海浪般的疑问，不断冲击着傅树介脑海，促使傅树介踏上社会主义之路。然而，社会主义对傅树介而言，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其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为实现此理想，傅树介打破了以往的沉默，并付诸于行动。

第一节 创立政治俱乐部

傅树介虽以社会主义作为其政治理想的追求，但单凭他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将之实现，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更何况此理想牵连着一一些重大改革，如未来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等，所以傅树介必须与志同道合之人合作，将力量团结起来。所谓“一根筷子易断，一把筷子难折”，只要将“不满的筷子”集合起来，就会是一种爆发力。于是，傅树介在 1952 年 10 月，即在马来亚大学求学期间，与拉惹古玛、P. Oorjitham（Philomen Oorjitham）、詹姆斯·普都遮里、兀哈尔、王赓武、林福寿等人，组成讨论小组，商议辩论学会的成立与其宗旨。商议不久

后，傅树介等人就将辩论学会延伸至政治学会，欲组成政治辩论学会，也在事前“获得马大校长麦唐纳氏及加恩爵士批准”（〈马大生首次政治性活动·组社会主义者俱乐部·事前曾获正副校长批准·始在其指导下起草章程〉，1953）。

1953年2月22日，傅树介等人在武吉知马（Bukit Timah）校园的化学系讲堂举行成立大会，吸引60至70位学生参与，其中也当然包括讨论小组的成员。在成立大会进行期间，突有人提议“成立社会主义俱乐部来替代辩论学会”（Tan, 2011, p. 37），从而导致现场出现混杂之声，相互争论着“拟议中的俱乐部应该成为一般的政治讨论俱乐部还是社会主义俱乐部”（Poh, 2010b）。历经一番激烈的辩论，终决定成立社会主义俱乐部，一个将在公开和宪制环境下进行活动，开放给广大反殖和欲争取独立的人们参加，以提供一个平台给他们发表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意见的俱乐部。与此同时，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也正式宣布成立，并成为马来亚大学“创办以来之第一个政治性俱乐部”（〈马大生首次政治性活动·组社会主义者俱乐部·事前曾获正副校长批准·始在其指导下起草章程〉，1953）和傅树介首次踏入有关政治言论的俱乐部。

成功创立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后，就开始选出其委员，但“当时有很多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员都是理想主义者，秉承着近似于费边社会主义的政治观”（Yap & Leong, 2009），加之，王赓武也“认为只有他的好友兼舍友詹姆斯·普都遮里对复杂性的社会主义者存有一些了解。”（Yap & Leong, 2009）虽然詹姆斯·普都遮里对社会主义有所概念，但他却拒绝加入中央工作委员会（Central Working Committee，简称

CWC），仅担当普通会员。因此，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首届中央工作委员会就由傅树介担任该俱乐部财政，王赓武、P. Oorjitham 和兀哈尔则分别担任该俱乐部主席、秘书与出版秘书。1953 年 7 月，首届中央工作委员会任期结束，傅树介与拉惹古玛决定接管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成为第二届中央工作委员会的主席与秘书长。直至第二届中央工作委员会任期结束，傅树介与拉惹古玛相互交替职位，担任第三届中央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与主席。简言之，傅树介在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期间，前后担任了财政、主席与秘书长之职，并以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宗旨为目标。

据《星洲日报》报道，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宗旨是在马来亚大学正副校长（Malcolm John MacDonald 与 Sydney Caine）指导下起草。有关的宗旨内容为：

- （一） 促进学生从事政治性讨论及活动
- （二） 促进社会主义思想
- （三） 支持学生会争取学生之权利
- （四） 研究如何团结马来亚（〈马大生首次政治性活动·组社会主义者俱乐部·事前曾获正副校长批准·始在其指导下起草章程〉，1953）

从以上内容来看，不难看出该俱乐部宗旨是从内部扩展至外部，由小至大，有规模地显示其中目的：第一和第三条宗旨，该俱乐部以学生为对象，一方面激起学生对政治的讨论与活动，另一方面则是要维护与扩大学生权利；第二条宗旨，该俱乐部可说是以师生民众为对象，宣传俱乐

部的思想取向，即社会主义思想；第四条宗旨，该俱乐部跨越师生民众，进而以国家为对象，试图研究如何团结马来亚，以达到建国之效用。综合以上各条宗旨，显示出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是一个反殖、自由、争取平等、独立自主的俱乐部。无疑，这些就是傅树介所追求的社会主义，而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则是傅树介追求其政治理想的第一个舞台。

第二节 创办《华惹》编辑部

《华惹》伴随着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诞生而出版，以“宣传社会主义观点，揭露殖民主义的邪恶、资本主义的失败、本地政治领袖和当局的缺点与欺诈手段”（Jeyaraj Rajarao, 2010）为目标，是一份弥漫着社会主义色彩，敢与英殖民政府和黑暗势力斗争的英文刊物。其原名为《俱乐部喉舌》，后经过傅树介与《华惹》编辑部委员的商议，一致决定采纳 Hedwig Aroozoo（今名为 Hedwig Anwar）向詹姆斯·普都遮里建议的刊名——《华惹》。《华惹》一名取自 Omar Khayyam 诗句，在马来语中附有黎明之意。

早期的《华惹》，由首届出版秘书兀哈尔独自负责出版与编辑，是一份主要在校园内分发，以油印方式和学生自助出版的刊物。另，《华惹》的内容极广，拥有着各式各样的文章，没有统一的主题，有如刊载于《华惹》第一期与第二期的文章：〈政治研究〉（STUDY IN POLITICS）、〈政治紊乱〉（POLITICAL DERANGEMENT）、〈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英国社会主义研究员讨论英国的社会主义〉（BRITISH FELLOW SOCIALISTS DISCUSS BRITISH

SOCIALISM)、〈我们的政治保姆〉(OUR POLITICAL NANNIES)、〈恳切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与阿德莱·史蒂文森的会议〉(MEETING WITH ADLAI STEVENSON)等,皆讲述有关政治、社会主义派别的成立、对社会主义的观点、会议内容等。

1953年7月,兀哈尔的任期结束,继由 Kwa Boo Sun 担任出版秘书一职。直至同年10月22日,《华惹》第三期刊载了 Lee Ah Chai 撰写的“对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批评”(A CRITICISM OF THE SOCIALIST CLUB)一文后,促使《华惹》的出版不再是出版秘书一人的工作,从而扭转了《华惹》的命运,成为《华惹》的转折点。Lee Ah Chai (1953)在文章里提到,“《华惹》应该要由编辑委员会执行,但却从来不曾委任编辑委员,导致工作效率下降。”,意为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应该为《华惹》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将工作效率提高。为此,身为第二届中央工作委员会主席的傅树介便开始与其他委员着手成立《华惹》编辑部,成员包括傅树介(主席)、Kwa Boo Sun(出版秘书)、拉惹古玛、詹姆斯·普都遮里、Lam Kuan Kit、P. Arudsothy、Thomas Varkey、Jeyaraj C. Rao 与 Edwin Thumboo,共九人。

自《华惹》编辑部成立,傅树介亦随即担任起领导者角色,带领编辑部成员商讨有关《华惹》的重要改革,如刊物的命名、出版方式、销售范围、几时出版一次等内容。经过一番讨论后,傅树介与《华惹》编辑部的全体委员决定:(一)将俱乐部刊物命名为《华惹》;(二)每月定期出版《华惹》,成为俱乐部月刊;(三)采用印刷方式出版《华

惹》；（四）在校内外发行《华惹》；（五）决定《华惹》售价，一份 20 仙。在内容方面，傅树介更为强调遵从《华惹》目标，极力批评英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弊端，揭露殖民当局与领袖的恶行，以呼唤或激起人民的觉醒意识，正如〈“民主”来到马来亚〉（“DEMOCRACY” COMES TO MALAYA）、〈对亚洲的侵略〉（AGGRESSION IN ASIA）等文章。

有鉴于此，《华惹》在傅树介的领导下，更为充满着热情洋溢的政治评论，就好像一把插入英殖民主义者心脏的锐利钢刀，绞痛英殖民主义者，特别是越南奠边府失陷后所刊载于《华惹》第七期（1954 年 5 月 10 日）的社论——〈对亚洲的侵略〉，不仅呼吁人们追求和平与自由，同时也谴责西方帝国主义，批评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 SEATO），从而引起殖民当局的怒气，并对《华惹》编辑部委员采取一系列的逮捕行动。据罗家成、廖波伦、林增如与成国泉（2012, p. 63）一同撰写的《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与马来亚的争夺战——现代化的纠结》（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Contest for Malaya: Tangled Strands of Modernity）所述，“总检察长 Davis 于 5 月 23 日看到《华惹》第七期后，指示政治部调查出版该刊物的负责人”，后于 5 月 27 日得到副校长 Sydney Caine 的同意，对《华惹》编辑部委员进行调查。

隔日（1954 年 5 月 28 日）清晨 5 时许，警方分别在加东（Katong）逮捕傅树介；巴德申路（Paterson Road）与杜尼安路（Dunearn Road）的马大学生宿舍逮捕 Kwa Boo Sun、拉惹古玛、詹姆斯·普都遮里、Lam

Kuan Kit、P. Arudsothy 和 Thomas Varkey，而 Edwin Thumboo 则在午前被捕。前后加起来，警方共逮捕了八位《华惹》编辑部委员⁸，且以“（一）有于五月十日，出版煽动刊物，名为《华惹》第七期，系马大学生社会俱乐部机关报；（二）五月廿八日收藏上述煽动刊物，有违犯一九三八年煽动条例第四条”（〈马大七学生被控·出版煽动刊物〉，1954）罪名控上法庭，由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兼会刊《华惹》的法律顾问李光耀担任初审阶段的辩护律师。⁹直至 8 月的审讯，才转由英国著名女皇律师毕礼特担任辩护律师，李光耀则从辩护律师转为助理律师。在两位律师的协助下，《华惹》案件终于在 8 月 25 日结束审讯，傅树介等人在无须答辩的情况下，被判无罪释放，成功打赢了这场轰动一时的官司，摆脱殖民当局所赋予的煽动罪名。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扩展

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与《华惹》编辑部，虽然在形式上或政策上不尽相同，但却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为共同目标。由此可见，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与《华惹》编辑部都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就傅树介担任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兼《华惹》编辑部主席时，因《星洲日报》、《海峡时报》等报章刊登了《华惹》案件的发生与其审讯经过，而获得

⁸ 《华惹》编辑部原有九位成员，但后来因为 Jeyaraj C. Rao 请假几个月或辞职以专心念书之故，而被宣布其不是《华惹》编辑部成员。因此，在《华惹》案件发生之时，仅逮捕了八位成员。

⁹ 李光耀在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成立时，通过兀哈尔表示其有意为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与会刊《华惹》提供法律顾问服务。随之，当《华惹》案件发生，傅树介等人急需找寻律师为他们辩护，而大卫·马绍尔就是傅树介等人最先会见的律师。经过面谈后，大卫·马绍尔表示不会为此案件辩护，所以傅树介等人也不再对他作任何考虑。就此，傅树介等人惟有找寻法律顾问李光耀担任他们的辩护律师。

宣传效益，使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与其月刊《华惹》更为人知晓和更为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再者，《华惹》案件的胜诉更是锦上添花，不但增加了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会员与支持者，还分别增加了《华惹》的读者群，为《华惹》建立起比《马来亚胡姬花》（Malayan Orchid）更为广大的读者群，其中就包括当时的政治人物（Malcolm MacDonald、大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E. H. Oehlers等）与华文教育社群。

除一些内部效益外，亦同时对外部有着显著的影响，如：

马来亚和新加坡领袖更积极向英国争取自由；整个亚洲掀起争取独立的新政治浪潮，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评已获得人民强有力和广泛的支持；亚洲人不再苟且偷安或屈服于外来统治。

李光耀备受赞赏，被绝大多数新加坡人公认为一名杰出律师、策略家，有献身精神又可靠的左翼社会主义政治人物，坚持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反对殖民主义。他也被公认为维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先驱。（Jeyaraj Rajarao, 2010）

无可否认，《华惹》案件的胜诉就似一支无形的“强心针”，在无形中激励了马新与亚洲人民或各个领袖的斗志，使他们更勇敢与积极地争取自由、独立等，不再畏畏缩缩。换言之，《华惹》案件获得胜诉后，就随即以迅速的脚步唤醒广大民众，驱逐英国人退出马新，争取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等。另，李光耀作为《华惹》案件的助理律师，不多不少也增强了其个人形象，使其受到广大民众的赞赏与提高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从而沾上光圈。

以上种种效益或影响，无疑揭露出《华惹》案件拥有着催化作用。因此，傅树介期望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与《华惹》能够在《华惹》案件的风潮上继续前进，而与拉惹古玛构思两个活动，即“一、进一步提升《华惹》，使其更倍受信任与承认；二、他们希望该俱乐部能够举办有主题的论坛、辩论会与讲座，以启发和鼓励人民了解该俱乐部的目标”（Jeyaraj Rajarao, 2010）。在《华惹》案件的影响与这两个活动的实施下，《华惹》增加了其发行量，从原有的发行量（多米尼·普都遮里根据一份机密的情报报告指出《华惹》第五期和第六期发行了一千份，第七期则发行了六百份）增至每期发行约五千份；讲座的举办，亦成功吸引了不少在校者与外校者参与，如师生、公众人士与非会员等，常使讲堂出现满座之况。可见，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与《华惹》在《华惹》案件的影响和傅树介等人的积极领导与推动下，提高了其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和知名度，以至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期。

第三章 扩展政治圈子：从“林德宪制”到“合并白皮书”

《华惹》案件圆满落幕后，不但激起马新人民的反殖意识，而且还制造出一条通道，让有志之士相遇、相识、相知，可谓相当于一条无形的线，紧紧地将这批有志之士系在一块。1954年5月13日，新加坡华文中学生于皇家山脚下举行和平集会，要求免役，却不得其所，反遭英殖民当局的残暴镇压，导致多位学生受伤和被捕。在逮捕的学生当中，有的学生被判处三个月徒刑，有的学生被判缓刑六个月。面对此判决，学生大表不满，决定上诉。与此同时，《华惹》煽动案爆发，邀来英国著名女皇律师毕礼特和李光耀为辩护律师与助理律师，终获得全员释放之审判结果，大大地燃烧起华校生的希望，欲通过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委员的介绍，认识李光耀，后再进而通过李光耀来邀请英国著名女皇律师毕礼特为他们上诉。可见，华校生通过《华惹》煽动案所制造出的通道，寻求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委员的帮助。由此，傅树介、拉惹古玛、詹姆斯·普都遮里等人便充当了媒介，介绍李光耀予华校生，也从而让李光耀有机会认识到林清祥，并共同推进马新的独立。在李光耀与林清祥共同推进马新独立之时，傅树介亦从旁给予协助，渐渐扩展其自身的政治圈子。

第一节 林德宪制下的傅树介与李光耀

1953年，英国政府派遣以乔治·林德（George Rendel）为首的“制宪调查团”到新加坡制定宪法草案。接而在1954年2月，公布《林德宪制宪调查报告书》，内容为“在新加坡成立一个由32个席位组成的立法议会，其中7席由官方委任，25席由民选产生；然后在此基础上成立民选政府”（鲁虎，2004：39-40），将于1955年4月选举时实施。此宪法，毫无疑问地带动或刺激了新加坡的政治活动，导致多个政党相继成立，其中就包括了人民行动党。

人民行动党于1954年11月21日成立，由杜进才（人民行动党主席）、李光耀（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王永元（人民行动党财政部长）和九名中央党委委员组成，宗旨是：

不使用武力，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愿同各政党和工会组织密切合作，实现以下目标：

1. 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
2. 成立由华人和其他民族人等组成的民主政府。
3. 铲除贫富悬殊、不公平的社会制度。
4. 建立经济新秩序，让所有公民都有工作权力，享受劳动成果。
5. 确保人民享有基本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
6. 实现民族团结，建立稳定、繁荣、公正的社会。（张青，2004：

13）

从以上的宗旨与所设下的目标而言，人民行动党展现出多以人民利益着想的风范。这种风范的出现，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经过多次讨论所得出的结果，如在筹组期间，李光耀每两星期都会邀请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代表者傅树介和其他创党人一同出席位于 38 欧思礼路（Oxley Road），李光耀住家地下室举行的小组讨论会，以集合每个人的意见，制定出人民行动党的宣言和党章。就此情况下，傅树介除了成为人民行动党的重要见证人之外，亦同时与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有了联系，因为人民行动党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参与 1955 年 4 月 2 日林德宪制下的大选。换言之，1955 年 4 月 2 日林德宪制下的大选就是人民行动党成立后的第一个战场和第一个目标。

在这场名为林德宪制下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派出 4 名候选人角逐 4 个选区，分别为：李光耀角逐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选区；吴秋泉角逐榜鹅——淡滨尼（Punggol-Tampines）选区；蒂凡那（C. V. Devan Nair）角逐花拉公园（Farrer Park）选区；林清祥角逐武吉知马选区，而傅树介则成为李光耀的监察投票代理人（polling agent），协助李光耀在丹戎巴葛选区的竞选，但后因蒂凡那处于弱势之故，傅树介便辞去监察投票代理人之职，并向李光耀说道：“蒂凡那无法在这场竞选中获胜，战胜率仅有 50 比 50，而你却一定会在这场竞选中获胜，所以我决定到花拉公园协助蒂凡那。”（傅树介，2012 年 2 月 8 日）因此，傅树介等人组织了一批学生到花拉公园协助蒂凡那，使“蒂凡那拥有大量学生帮助他在花拉公园拉票，而在丹戎巴葛选区的李光耀则没有得到这般的支持。”

（Pang, 1971, p. 3）

1955年4月2日，全民进行投票，结果为：“劳工阵线获得10席（竞选17席），进步党得4席（竞选22席），民主党得2席（竞选20席），人民行动党得3席（竞选4席），华巫联盟3席，其余3席由小政党及独立人士获得。”（韩山元，2006：85-86）根据此结果所示，人民行动党的4名参选者中，有3名获选，1名落选，即李光耀、林清祥与吴秋泉三人当选；蒂凡那一人落选。其中就以李光耀的票数最多，与对手的差距较大。

历经此竞选后，傅树介与李光耀的关系没有得到升温，相反地，很快就来到了负点。所谓“相见好，共事难”，这就是导致傅树介与李光耀关系下降的主要原因。根据傅树介所述，在其向李光耀说及原由，提出辞呈之时，李光耀以“你收到命令”回复之。那么，这句“你收到命令”的话语里头，到底蕴涵着什么意味呢？其实在李光耀的自传《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中，写了以下这段话：

说华语和方言的左翼工会和华校中学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协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帮我和其他候选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如果我过去对他们听谁的命令还有怀疑的话，现在疑云全消了。（李光耀，1998：213）

试着将两者联系起来，就可看出李光耀当初所说的“你收到命令”，实有怀疑之意。因此，傅树介进而追问道：“什么命令？谁的命令？”

（傅树介，2012年2月8日），李光耀仅说了一句“你知道，我知道就够了”（傅树介，2012年2月8日）。这看似简单又易懂的九个字，却隐含了非一般之意，实“暗指傅树介正在遵从地下共产党的命令”（Poh,

2011)，但实际上，傅树介仅持以互助的心态来协助蒂凡那，因为在傅树介的角度而言，无论是李光耀或蒂凡那，都同属于一个党派，没有你我之分。自此，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傅树介也没有再参加任何主要的活动，仅与一些朋友保持联系或出席一些集会。直至 1961 年，傅树介才重新踏入政治活动。

第二节 筹组另一股势力——社会主义阵线

1955 年林德宪制大选后，新加坡进入另一阶段，即半殖民统治。在半殖民统治期间，新加坡仍受控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因此人民开始了一连串的反殖运动，犹如 1955 年 4 月至 9 月，“新加坡工人举行了 213 次罢工”（鲁虎，2004：40）；1956 年 3 月，“新加坡爆发‘独立运动周’，20 多万各族人民在独立意见书上签名，要求结束殖民统治，立即独立”（鲁虎，2004：40）。除了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殖运动外，大卫·马绍尔还于 1956 年率领各政党的代表到伦敦与英国政府谈判新加坡的自治问题，但却无功而返。直至 1958 年，在林有福的率领之下，达成协议，并在同年内核准和颁布“新加坡自治法”（The State of Singapore Bill）。所谓的“新加坡自治法”，其主要内容包括：

新加坡在英联邦范围内实行自治；马来亚人和少数民族的利益应得到平等的保障；立法会议员由原来的 32 名增加到 51 名，而且全部由民选产生；首席部长改为总理，对立法议会负责，部长全由当地人担任；英国取消总督，任命一名在马来亚出生的人为英王的代表，有权批准法律；英国保留国防、外交、修改宪法、颁布紧急法令的权力，继续控制在新加坡

的军事基地。（鲁虎，2004：40-41）

由此可见，英殖民政府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并未给予新加坡完全独立，仍持续控制着新加坡的国防、外交、修改宪法和宣布紧急法令的权力。进一步而言，“新加坡自治法”就只是让新加坡拥有了内部自治权，无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也就是说新加坡仍未得到完全自治的权力，仅处于半自治状态。

随着“新加坡自治法”的确立，英殖民政府也随即同意通过 1959 年的民主选举来成立新加坡自治邦政府。为此，人民行动党也随之“开始进行竞选活动，在各个选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自己的政策，揭发执政党的腐败现象”（张青，2004：15）。到了投票日，即 1959 年 5 月 30 日，人民行动党在 51 席中赢得 43 席，成为 1959 年自治大选的大赢家。自此，新加坡正式升格为自治政府，由李光耀担任总理，杜进才担任副总理，吴庆瑞担任财政部长，王永元担任国家发展部长，阿末·依布拉欣（Ahmad Ibrahim）担任卫生部长，贝恩（Kenny Byrne）担任劳工与律政部长，拉惹勒南（S. Rajaratnam）担任文化部长，王邦文担任内政部长，杨玉麟担任教育部长。

成为自治政府后的新加坡，一如既往地面对着“贫穷、高失业率、人口增长快、环境脏乱、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罗兆强，2010：72）等问题。于是，李光耀想借助合并之力，消除这种困境，以达到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稳等，可谓解决方案之一，亦被林清祥等人所认同。因此，李光耀与林清祥等人便开始着手讨论有关合并的问题，但却意外地在合并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导致人民行动党内

部一分为二，分成李光耀和林清祥两派。久而久之，李光耀与林清祥两派之间的矛盾就扩展至无法收拾的地步。就在此背景下，林清祥、方水双、李绍祖与兀哈尔连同 13 名左派人士退出人民行动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开始尖锐的斗争。与此同时，傅树介已从马来亚大学毕业，进入政府医院部门服务，在杨锦成的底下担任一名外科手术受训医生，后再成为竹脚妇科医院的妇产科受训医生，是一份富有前途的工作，但傅树介却坚决地辞去这份工作和毅然放弃到英国深造的奖学金（医学），宁选崎岖道路，与其他左派人士，如林清祥、方水双、李绍祖等人，联合组织社会主义阵线。

1961 年 8 月 13 日，社会主义阵线在快乐世界体育馆（Happy World Stadium）的 10,000 人（大约人数）面前宣布社会主义阵线已正式注册为新加坡政党。（详见“Barisan Socialis is registered,” 1961）其后，傅树介、林福寿、林清祥与方水双等人，一起齐心协力，组织社会主义阵线，并以建立“真正的内部完全自治的政府”（T. N. Harper, 2004: 47）为建党口号。除此之外，社会主义阵线还在 1961 年 8 月出版章程，清楚标明该党的目标有：“（一）铲除殖民地主义，建立一个疆域包括马来亚联邦与新加坡的统一的马来亚国；（二）基于¹⁰出生于或效忠于马来亚的成人普遍选举权，建立一个民主的马来亚政府；（三）实现一个确保社会繁荣、稳定和公正的经济制度；（四）动员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建立一个马来亚国族。”（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221）

¹⁰ 笔者认为此句中的“基于”，应是“给予”之意。

约一个月后，即 1961 年 9 月 17 日，社会主义阵线正式宣布成立，亦同时举行群众大会，并在大会上通过六项议案，即“（一）要求行动党政府立即举行全岛大选；（二）废除所有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特别是公安法令；（三）释放所有政治犯；（四）党与马、婆、汶三地社会主义党派密切联络，进行大合并事务；（五）扩大反殖运动；（六）希望各党摒弃成见，进行新马合并事宜。”（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221）

就以上的目标或通过的议案而言，无不显示出社会主义阵线是一个追求团结、民主、和平、公正、繁荣、自由等的政党，相当于该党徽的含义。根据照片所示（见附图一），该党徽是由一个圆形的圈圈和五个尖角的星星组成，相似于一枚戒指。以颜色而言，该党徽共有三种颜色，即白色、蓝色与红色。白色为底色，代表纯洁；蓝色为圆形的圈圈，代表人民团结；红色为五个尖角的星星，分别代表社会主义阵线的五个目标：民主、自由、平等、和平与繁荣。这些都是社会主义阵线的主张。

1961 年 10 月 3 日，社会主义阵线首次召开成立大会，推选李绍祖担任党主席，林清祥担任秘书长之职。另，其它职位就分别由兀哈尔担任副主席；傅树介担任副秘书长；刘坡得担任财政；黄信芳担任副财政；陈新嵘、陈炎成、方水双、林福寿、卓可党、林史宾、盛南君、多米尼·普都遮里、S. T. 巴尼（S. T. Bani）、巨克里担任委员；T. T. 拉惹（T. T. Rajah）、詹姆斯·普都遮里、陈维忠担任律师顾问；梁景胜与王清杉担任查帐员。可见，傅树介在社会主义阵线里头，担任了副秘书长一职，成为林清祥的“政治英语翻译员”（Dennis Bloodworth, 2005, p. 269），并负责提供意见或“讨论该党的问题与思想”（“Dr. Poh: Why I

parted company with PAP,” 2009)。自此，傅树介就与这批有志之士成为战友，携手迈进，共同将社会主义阵线成立为新加坡另一股强大的势力。

第三节 合并白皮书之争议

有关马新合并的历史书籍，出现了两派人，一派为支持合并，另一派是反合并。根据有关书籍所示，支持合并的一派人为李光耀、马来亚联邦总理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英殖民政府、王邦文、杜进才等；反合并的一派人则为林清祥、傅树介、林福寿、方水双等，但这一批被记载为反合并的人，真如历史书籍所记载吗？他们真的是反合并吗？若真如历史书籍记载，为什么林清祥还是人民行动党的一员时，会认同合并的想法呢？为什么由傅树介、林清祥、林福寿、方水双等人联手组织的社会主义阵线会以“铲除殖民地主义，建立一个疆域包括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的统一的马来亚国”（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221）、“党与马、婆、汶三地社会主义党派密切联络，进行大合并事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221）、“希望各党摒弃成见，进行新马合并事宜”（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221）为目标呢？这不就出现了矛盾吗？

首先，在1961年5月27日，原担心马新合并会出现华人的比例多于马来人之况，而反对马新合并的东姑阿都拉曼，在新加坡阿达菲酒店出席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举办的午餐会时，发表演讲，说道：“今日的马来亚作为一个国家，觉察到它不能独守一隅而处在孤立之中，除了国际政治外，国家政治必须要有广阔的基础。早晚之间，它将与英国以

及新加坡、北婆、汶莱和砂劳越的人民取得谅解。现在要我说如何去取得更密切的了解，讲来还是为时过早，但，这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前瞻这个目标并想出一项计划，将这些区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合作，聚合得更为密切。”（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236）同一天，东姑阿都拉曼还在联邦大厦向新加坡巫统党员说道：“新加坡虽然自治，仍然在英国人控制之下，汶莱、砂劳越及北婆也仍然在英国人手中，所以，要说联合邦如何与它们进一步合作是很难的。联合邦政府正在考虑这个问题。”（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236）意为东姑阿都拉曼已赞成马新合并一事，但前提是必须同时与北婆罗洲（沙巴）、汶莱和砂劳越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就在这样的发展下，李光耀毫无异议地接受之，并认为这合并“就像太阳东升西落，无法避免”（Lee, 1961, p. 3），而且“我们无法独自生存。如果我们延迟合并，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一位工人、小贩、书记、技术员或商人，皆会受到影响。生意会减少，利润会减少，报酬会减少，就业机会也会减少。”（Lee, 1961, p. 5）在如此的理由下，李光耀与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皆在这一夕之间，与东姑阿都拉曼同站一战线，共同以合并为目标。随后，李光耀与东姑阿都拉曼商讨合并事宜，终达成协议后，于1961年11月，通过白皮书在立法议院提出其中的主要项目：

1. 合并后，新加坡在联邦下议院获得15席，在上议院获得2席。
2. 62万4000个新加坡公民将保留在新加坡享有的州公民权。合并后新加坡公民将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国民，获得与大联邦其他国民相

同的护照。他们将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样受到保护，尽同样的义务。

3. 新加坡公民与马来亚联合邦公民将来都只能在各自的邦内享有选举权与投票权。换言之，新加坡州公民只能在新加坡参与竞选与投票，马来亚联合邦公民只能在马来亚半岛参与竞选和投票。
4. 新加坡自由港的地位不变。
5. 新加坡政府的指挥与控制权将维持现状，由总理和根据他的建议委任的部长组成的内阁执行。新加坡现有的立法议院将成为州议院继续运作，但无权制订有关防务、外交、安全和其他联邦事务的法律。
6. 新加坡在教育和劳工政策方面将享有自主权，同时获得比联邦其他州更大的保留权力。
7. 新加坡将保留大部分的州税收，四分之一的税收上缴中央政府。
8. 成为新加坡公民的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将受到保障。（韩山元，2006：106）

以上皆属李光耀与东姑阿都拉曼会谈后所达成的协议。这种种协议对李光耀而言，实是无伤大雅，不会影响其政治生涯，但对于新加坡人民而言，是极为不公与不利，而且与社会主义阵线主席李绍祖于 1961 年 8 月 29 日宣布 13 个社会主义阵线议员所接受的马新合并内容有所出入。据《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记载，这 13 个社会主义阵线议员将接受：“一、新加坡同马来亚实行全面和彻底的合并，作为马来亚联邦的第 12 个州；或是二、新加坡先成为马来亚联邦里的一个自治单位，最后才并入马来亚联邦。如果采取合并办法，本党要求新加坡作为组成的一州，

马上加入联邦，新加坡公民将自动成为马来亚公民，新加坡在马来亚国会应有合乎比例的代表人数。合并之前，新加坡举行大选；合并之后，全马来亚举行大选。如果采取邦联办法，本党要求新加坡实行内部完全自治，内部事务，包括安全，由自己掌管，外交和防务则交由联邦政府负责。”（李光耀，1998：455-456）明显可见，这与合并白皮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马来亚公民、马来亚国会、新加坡安全等问题。因此，代表着傅树介、林清祥、林福寿等人的社会主义阵线与其他左派提出强烈反对：

1. 按照有关的规定，新加坡公民将沦为二等公民，理由是：新加坡在联邦下议院只分配到 15 席，这是对新加坡的歧视，因为马来亚联邦是每 2 万名左右的选民就可以选 1 个国会议员。按新加坡的选民人数（60 余万），至少应该分配到 30 个议席，而不是 15 席。
2. 联合邦公民选出的中央政府统治新加坡，而新加坡公民却无权选择中央政府。
3. 白皮书规定新马两地的公民不能到对方的地区竞选与投票，实际上就是政治权力的区割，这表明马来西亚的成立并非真正的新马合并。社阵指这是“假合并”。（韩山元，2006：106-107）

根据上述的提出，大可知傅树介、林清祥等人是主要以公民权提出争议。在合并白皮书的其中一条协议，注明马新合并后，新加坡公民将保留其新加坡公民权，并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国民。这一条协议，很显著地说明新加坡公民在马新合并后，就仅是马来西亚国民身份，非马来西亚公民，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够享有联邦政府议会选举的投票权和不能够

享有就业与居住的行动自由。因此，社会主义阵线提出以上的反对内容，并说道：“他们准备放弃劳工与教育的自主权，以换取共同的公民权和按人口比例取得国会代表权”（Tan, 2001）。有鉴于此，大可得知傅树介、林清祥等人所追求的合并是要在一个公平、民主、统一的情况下进行。换言之，他们是同意合并，反对不公或私利化的合并。

持续合并声势的浩大，社会主义阵线进而要求举行大选，以征求民意，但人民行动党却反对之，接而提出举行全民投票。1962年9月1日，举行全民投票。选票上共有A、B、C三项选择：

- A. 我支持合并，星加坡应根据一九六一年所发表议院文件第三十三号白皮书所载列的建议，获得劳工，教育及其他议定事项的自主权，同时星加坡公民将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 B. 我支持全部及无条件的合并，星加坡应以一州的地位，根据马来亚联合邦的宪法文件，与其他十一州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并。
- C. 我支持星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条件应不逊于婆罗洲地区所获得者。

（Singaporean National Referendum, 2012）

三个选项皆标明“支持”的字眼，无论选哪个，合并都会得到支持，不同的只有合并方式，就犹如Lau（1998, p.13）所言：“人民行动党政府要求人民选择支持的合并类型，而不是他们是否支持或拒绝合并。”在A选项，经过李光耀与东姑阿都拉曼的再次交涉，新加坡公民得以在马新合并后，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但却依然与B和C选项一样，无法按新加坡人口比例获得应有的国会代表权。在这样的选项下，社会主义阵线呼吁人民投空白票，表示拒绝三个选项。最终结果为71.1%的人支持

A 项； 1.7%的人支持 B 项； 1.4%的人支持 C 项； 25.8%的人投空白票，
意为人民行动党赢得了胜利。

第四章 坚定不屈：宁为坐牢，不为苟同

经过合并白皮书一事后，更让人确定傅树介、林清祥、林福寿等人与李光耀、东姑阿都拉曼等人，实属两派人物，互相对立。前者代表了民主，后者则延续了英国人的衣钵，就好比如日后发生的“冷藏行动”与未经审讯的扣留，揭发了李光耀的另一面，同时还导致被捕者，如傅树介、林福寿、林清祥等人背上莫须有的罪名。虽然如此，但傅树介与林福寿等人却毫无畏惧，一点都没有想要委曲求全或低头的意思。

第一节 二·二大逮捕

自傅树介、林福寿、林清祥、李绍祖等人成立社会主义阵线起，他们就自然而然地站到李光耀的对立面，成为李光耀的劲敌，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乃至动摇其地位。因此，李光耀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地位、政治生涯，便开始与英殖民政府和东姑阿都拉曼进行有规划的计谋。根据傅树介在《〈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撰写的第十章〈冷藏行动中 被扣留——对帝国主义的研究〉（Detention in Operation Cold Store: A Study in Imperialism）文章所引用的英国国家档案馆资料所示，大略可获知李光耀的最终目的是要铲除为他设起重重路障的眼中钉，以更为巩固其自身的地位。在 1962 年 6 月 1 日，Moore 写给殖民部大臣的信件内容中，提到：

一打开话匣子，李（光耀）就告诉我，他与您在两次面谈时证实，英国政府将全力支持在全民投票之后、合并之前通过内部安全委员会逮捕林清祥及其追随者。我说我的讯息是……如果他有意，我可从您那里获得证实。后来他又改变说法……。全民投票后才逮捕没有问题，不过目前不必作任何决定。（Poh, 2010c）

这封信毫无掩饰地指出，李光耀欲在全民投票后，合并之前，通过内部安全委员会（由英国、新加坡、马来亚联合邦组成）逮捕林清祥与其追随者。那么李光耀所谓的林清祥追随者又包括谁在内呢？这一答案隐隐约约地出现于新加坡政治部的报告中：

- (1) 放逐：（那些在联邦出生者将被逐出境）在联邦选择一些地方来限制和控制他们的行动。应受此行动对付的包括方水双、兀哈尔、多米尼·普都遮里、曾超卓、林史宾、陈德华、方明武、林文才、林清如。非新加坡和非联邦的公民 T. T. 拉惹及 K. Koya, 也一样会被放逐。
- (2) 逮捕和扣留（新加坡公民）：要辨认统一战线领袖当中的所有共产党人是不可能的……。不过统一战线的主要领袖包括林清祥、兀哈尔、林福寿、傅树介、曾超卓。（Poh, 2010c）

这份报告明显地表达出，李光耀所要放逐、逮捕和扣留的人。其中或许会有少许的偏差或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傅树介、林清祥、林福寿、兀哈尔、曾超卓等人，皆被李光耀视为眼中钉，是要铲除的对象。接下来，试将这份报告与 Moore 写给殖民部大臣的信件内容连到一块儿，就

可看到李光耀计谋的轮廓，即在全民投票后，合并之前，通过内部安全委员会放逐抑或逮捕和扣留傅树介、林清祥、林福寿、兀哈尔等人。

1963年2月2日凌晨，李光耀的计谋正式实施：

行动于凌晨2时15分开始。为了确保安全，逮捕队伍在联邦警察的配合下于柔佛州30英里外集合。逮捕队伍大约于凌晨3时15分超过长堤。到了早上9时10分，已有97人被逮捕，包括几乎所有的领导人物。警方希望到了中午，被逮捕人数的总数将在110与120之间。这是令人满意的，过后将有更多人被捕。（Poh, 2010c）

以上这场大逮捕行动被名为“冷藏行动”，顾名思义，就是将逮捕的人“冷藏”起来。根据1963年2月6日的《海峡时报》报道，这场被名为“冷藏行动”的大逮捕行动，分别逮捕了社会主义阵线领袖、人民党（Party Rakyat）领袖、工人党（The Workers' Party）领袖、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学生等，其中就以社会主义阵线的逮捕人数为最，共逮捕了24人：林清祥、兀哈尔、詹姆斯·普都遮里、林福寿、傅树介、陈炎成、黄玉玺、叶树仁、多米尼·普都遮里、方水双、李朝明、许南星、卓可党、陈一峰、陈根源、黄金汉、纪水万、张少军、符致渔、曾超卓、谢炎辉、司徒志光、王元标、林史宾，同时损失程度也比其它政党来得多、来得重。（详见“Who's who in the big round-up: count shows Barisan suffered the heaviest casualties,” 1963）

从整个逮捕行动的过程，由策划至实施，傅树介皆毫无幸免地被列入黑名单之中，且在“一个充满着狗的狂吠声，到处都有一群全副武装的廓尔喀警察（Gurkha police）、吉普车和越野车的凌晨下被捕。”（详

见 Poh, 2010c) 其后，遭到逮捕的傅树介，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其扣留令里，总共列有五项指控，即：“一、我是亲共产主义的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成员；二、我是亲共产主义报——《华惹》的编辑；三、我是亲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阵线助理秘书；四、我帮忙组织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大会；五、黑色一片，没有任何指控。”（傅树介，2012年2月8日）自此，傅树介也就结束了其政治生涯，开始另一段拘束的生活。

第二节 铁窗生活

傅树介自 1963 年 2 月 2 日凌晨，被逮捕后，就被送往欧南监狱（Outram Prison）的牢房，单独监禁大约四、五个月时间。依吴静明¹¹对欧南监狱牢房的形容，它其实是个“左右手一字形伸开，两手的指尖触到两边的墙壁，估计大概是六呎宽；中间摆放着一张铁的单人床，是嵌在水泥板上的，床尾与门之间还留下一点空间，估计房间的长度是八呎左右。床上放着两条劣质的单人被，两条‘祝君早安’的单薄面巾，一个上六寸宽、下四寸宽、约十寸高的铝杯，还有一个比水桶大得多的、像饭锅有盖的铝制产品”（吴静明，2010：106）。从中，大可想象得到，傅树介被剥夺一切后，第一次步入的牢狱生活就是在一个没自由、没厕所、面积极小的牢房里，而且文中所提及的“一个上六寸宽、下四寸宽、约十寸高的铝杯，还有一个比水桶大得多的、像饭锅有盖的铝制产品”（吴静明，2010：106），前者是一个用以盛水的杯，后者则是拥有着厕

¹¹ 吴静明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恩平，亲身经历了抗日、抗英的岁月，亦曾投身于职工运动，并于二·二大逮捕中被捕。

所般用途的大桶。根据傅树介的回想，在欧南监狱单独监禁期间，是无法接触到阳光的温暖，目睹草绿色的树叶，只一味地被监禁于不知时日、四面都是墙的牢房中，甚至连吃喝拉撒都必须在这个框框内。除此之外，傅树介所佩戴的眼镜还被没收，亦被禁止阅读和书写，促使傅树介无法得知外面的情况，完全与外界隔绝。

约四、五个月后，傅树介离开了欧南监狱，被送至樟宜监狱（Changi Prison）范围内的中等设防监狱（Medium Security Prison），与陈木庭、陈业盛和其他七人一起住在三间房的牢房内（两间房分别住着五人；中间房则用以吃饭和煮食），并过着较为自由、轻松的狱中生活，所以中等设防监狱又被称之为“自由营”。

待至两年余，即马新分家前大约五个星期，也就是 1965 年，傅树介被转到罗敏申路刑事调查局（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的政治部总部。在那里，傅树介曾与政治部副主任 Yuen Siew Wah 会面。会面期间，Yuen Siew Wah 不转弯抹角，直接向傅树介说道：“该署已建议释放你，但这建议并不是基于你对国家的安全问题已清除，因为你没作出保证国家安全的声明，而是基于我们认为你被释放后，不会威胁国家安全。”（详见 Poh, 2010c）话虽如此，但傅树介却迟迟都未收到其释放令。直至马新分家后的第二天，傅树介获得两种选择，即“接受通常的释放条件或被送回樟宜。”（Poh, 2010c）所谓“通常的释放条件”，不外乎就是发表悔过声明、谴责共产主义、放弃政治等。对于如此的抉择，傅树介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此，傅树介无法获得释放，反之，傅树介获得了新的扣留令，以延长其扣留期限。

在新的扣留令发出的两年后，即 1967 年年底，傅树介被咨询委员会（由一名法官、杨锦成和林先生组成）审问。审问期间，法官向傅树介说：“释放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与左派‘脱离关系’和谴责左派。”（详见 Poh, 2010c）对此，傅树介回答道：“我不会谴责任何没有害过我的人或政党。我不会谴责回教徒或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建议，如果你们坚持要我脱离左派，那事实就是自从我被逮捕后，就没有向你们所认为的左派，即社会主义阵线缴交过党费。再者，被视为左派的社会主义阵线也是我被逮捕的原因，但我现在已不是党员了。”（详见 Poh, 2010c）这一回答，马上被他们所同意，并向傅树介和其律师林泉和保证，他们会建议释放傅树介。

不久，有两名政治部高级官员：Michael Chai 与 L. W. Koh，亲自到樟宜会见傅树介，并告知“因为你不接受政府的一般释放条件，所以你不会释放。人民行动党拒绝接受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详见 Poh, 2010c）就这样，傅树介的扣留令又再次翻新，继续被扣留在中等设防监狱，与吴静明、王明任、黄金汉等人同住。据吴静明在《走不到终点的人》一书中所述，他与傅树介等人同住于中等设防监狱的情况：

“自由营”隔有三间房。正面有一片小空地，种了两棵酸柑、三棵林檎。房的左边有大约一百平方呎的地方，盖有屋顶向外伸、没有围墙，是大家的运动室。傅树楷以水泥浇铸了几块“铁饼”模，大小重量不一，套进一根横木的两端，就可以练习举重！再向左边走出去，是一个篮球场，牢房的前前后后，还有些小空地，种几株木瓜，有时种点毛瓜，有时种点苦瓜，有时种点芥菜……（吴静明，2010：106）

被称之为“自由营”的中等设防监狱，不仅让傅树介、吴静明、王明任、黄金汉等人享有一些行动上的自由，而且还让傅树介享受到欧南监狱所享受不到的生活气氛，如以下这段谈话：

“老广府，来，看你拿得起吗？”树楷看到我坐在门口穿鞋，于是叫我过去。

“老福建，你叫我啊！什么？拿臭铁！”我却以闽语回答。

“喂！‘骆驼’叫你都不给面子啊！”黄金汉也来叫我了。

“‘老君’叫你来，你就来嘛！”“大苦”王明仁以闽语说。（吴静明，2010：106）

文中的谈话内容，无疑显示出一种和乐融融、舒畅的生活气氛。再者，他们互相以匿名称呼对方的方式，犹如以“老广府”¹²称呼吴静明；“老福建”¹³、“骆驼”¹⁴、“老君”¹⁵称呼傅树介；“大苦”¹⁶称呼王明任，皆表现出他们在狱中对彼此的亲切度与融洽度。这些都是傅树介无法在欧南监狱体会到的，但遗憾的是，如此愉快的生活就似时间飞逝般，很快地就宣告结束。

1969年初，傅树介转移到Mount Rosie，居住在 Michael Chai 副警监的半独立式洋房的附加小房屋，以等待其释放令。然而，在傅树介等待的期间，“樟宜监狱爆发了长期绝食行动，以抗议强迫被扣留者工作，后来结束了。清除嫌疑分子的‘黑色行动’拉开序幕。李茂成与《南洋

¹² “老广府”的称谓是来自吴静明的祖籍。

¹³ “老福建”的称谓是来自傅树介的祖籍。

¹⁴ “骆驼”的称谓是来自傅树介的职业，因为“骆驼”是英语“Doctor”的谐音。

¹⁵ “老君”的称谓是来自傅树介的职业，因为“老君”在闽南语是医生的意思。

¹⁶ “大苦”的称谓是来自王明任高大的身材，因为“大苦”在闽南语是“大只佬”的意识。

商报》的编辑被扣留。英文报 ‘The Herald’ 被暂停。Michael Chai 与 L. W. Koh 也受到了怀疑。Michael Chai 被调离政治部。” (Poh, 2010c) 这种种事件，特别是 Michael Chai 被调离政治部一事，不多不少都会对傅树介的释放令有着影响。根据傅树介所言，Michael Chai 搬离洋房后，他并没有即刻被送回樟宜。相反的，Gerald de Cruz (前马来亚民主同盟及劳工党成员) 还到访过两次，但最终目的都是要傅树介同意一般的释放条件，而傅树介也理所当然地拒绝之。其后，傅树介被送至明月湾中心 (Moon Crescent Centre, 简称 MCC)，直至 1973 年 12 月 13 日释放，共监禁长达 10 年又 10 个月。

释放后，傅树介一方面在人民药房当医生，另一方面则是无视当局禁令¹⁷，激进地与其他四位同志，即 P. 哥文达三美 (P. Govindasamy)、刘亚烈、傅仰耀和陈金城一同发表联合声明，描述各自被拘禁的情况，并勇敢地呼吁人民行动党政府无条件释放被拘禁的战友们。除此之外，傅树介亦与 G. 拉曼 (G. Raman)、迈克尔·费尔南德斯 (Michael Fernandez)、王木泉等人，一同筹组公民权利团体 (civil rights society)，并成为公民权利团体的筹备委员会会员。这一系列的行动，导致傅树介于 1976 年 6 月 4 日早上，在其公寓的停车场，被内安局官员逮捕，并送至惠特利路扣押中心 (Whitley Holding Centre)。

¹⁷ 在傅树介获释当天，曾被一位新加坡内部安全局的高级官员劝说：“获释后不得宣传和不能为拘禁中的同志寻求释放。这不仅是对你有危险，而且也会令他们更难获得释放。” (详见 Dr Poh Soo Kai and MHA’s fiction of his involvement with the injured bomber (Part 1), 2011) 可见，傅树介的禁令就是不能够作出任何宣传和不能为战友们寻求释放。

对于此次的逮捕，傅树介依然是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据悉，傅树介居住在“位于一个 U 字形平面混凝土屋顶的单层建筑物的一翼。在另外一翼则有着更多的牢房。狱警的哨站和厕所占据两翼的交界处。在建筑物的中间，是一个运动院子，四面都用围墙与牢房隔开。围墙很高，只能看见斜角的天空和远处的树木顶端。牢房大约有 5 英尺长、10 英尺宽，中间有个固定铺位。”（Dr Poh Soo Kai and MHA's fiction of his involvement with the injured bomber (Part 1), 2011）的惠特利路扣押中心的牢房期间，除了被禁止阅读任何刊物、强迫换上一件 T 形恤衫和棉制短裤、没收眼镜和手表外，还遭受到冷酷无情的审讯：

逮捕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傅树介）大约在上午 6 时被惊醒。梳洗后，我遭到长达一天的审讯，直至午夜。我的审讯员是三班制。那房间里的空调非常冷，而且非常不舒服。这例程成为了日常事务。（Report of 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Singapore: 30 November to 5 December 1978, 1980, p. 19）

据此，大可了解到，傅树介在惠特利路扣押中心的生活就是每日都必须待在冰冷的审讯室，接受超过 12 小时的审问。这一日又复一日的的生活，持续至“1976 年 7 月 3 日，即历经上午 8 时至午夜 12 时的四星期审讯后，傅树介医生接获指控他支持‘共产主义阵线活动’的扣留令，然后再被转移到明月湾中心，继续其拘留。”（Report of 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Singapore: 30 November to 5 December 1978, 1980, p. 19）

明月湾中心，“是一个拘留中心，位于樟宜监狱的背后，里面有一批由高墙间隔着的双层牢房。这些牢房分为三种类型，有三个囚室、五个囚室和八个囚室的。这些囚室和冲凉、如厕的地方，都设在楼上，排成一字长蛇阵。乒乓室、吃饭的地方和监狱的看守室，都设在楼下，占据了半个牢房的长度。”（张泰永，2010：74）除一些主要设备外，里头还附有活动的空地，以15英尺高墙围住，宽约25英尺，长30至50英尺，须视牢房的面积而定。至于每天的作息时间表，都有一定的规定：“早上6点，囚室的铁门打开去洗脸；7点，到楼下吃早餐，吃完早餐，又回到楼上囚室关押。午餐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之后又返回囚室。下午4点喝茶和活动，5点又上楼，6点再下楼用晚饭。晚上7点被关进囚室直至第二天早上6点。”（张泰永，2010：74）

在如此的环境下，傅树介待了大约几年，还曾被单独监禁在八间囚室的牢房内，近一年之久。在这一年内傅树介的爱妻，Grace Poh 被捕：

在1977年2月19日，傅树介医生的妻子，Grace Poh 也被政治部蒙上眼睛，逮捕至惠特利路扣押中心。在惠特利路扣押中心，傅太太被单独监禁27天后才被释放。期间，她长期在装有空调的房间，接受政治部官员的质问和审问，而且一次的审问可达数日之久。（Report of 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Singapore: 30 November to 5 December 1978, 1980, p. 1)

对于 Grace Poh 被捕一事，其实并非因其参与政治活动或触犯任何条例，纯属就只是政治部的目的。根据 Report of 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Singapore: 30 November to 5 December 1978 记载，这举动的目

的就是要“给傅医生带来极大的困扰和让他忧虑其妻子的命运，以期从中获得他的‘自白书’和撤回他对政治的主张。”（Report of 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Singapore: 30 November to 5 December 1978, 1980, p. 19）为此，政府并没有公开报道 Grace Poh 被捕一事，仅将此事告知予傅树介，并允许傅树介到惠特利路扣押中心探访。毫无疑问，这手段的确让傅树介陷入困苦的漩涡之中，但傅树介依然坚决地忍痛割爱，推辞探访其妻。

其后，傅树介被命令“收拾东西”¹⁸，跟随狱卒离开八间囚室的牢房，走入有盖的长廊，再“经过通往其他牢房的侧门，通往会客室的大门、行政楼的大门、官员喝茶和接待室、监狱主任办事处和关押女人的牢房”（张泰永，2010：74-75）后，傅树介来到了一个五间囚室的牢房，与其旧日战友何标、谢太宝和曾福华同处于一个牢房内。期间，傅树介喝完下午茶后，不管是晴天或雨天，他都会在监狱的空地上跑步，并鼓励他们一起参加锻炼，因为傅树介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克服大家所面对的精神忧郁压力。

经历一间又一间的狱所后，傅树介于 1980 年，被单独监禁在惠特利路扣押中心的一间大囚室里，并大约每星期被带到审讯室闲聊一次。闲聊的话题多是围绕在健康问题和读报。1981 年，傅树介的健康出现问题，被送至樟宜监狱治疗，但傅树介仍不见好转，依然头痛得很严重和不停呕吐。随后，傅树介就被送入监狱医院，服食了两粒“Panadol”。与此同时，那天也恰巧是傅树介家属来探监的日子，于是傅树介将自己的病情告诉家人。待傅树介的父亲知道后，很是担心，便致电给傅树介的弟

¹⁸ 傅树介的东西就只有两件背心，两条短裤，五本书和一条“祝君早安”的洗脸巾。

弟，树川，向他述说傅树介的情形。随之，傅树介的弟弟也急忙联系在卫生部工作的朋友，以安排樟宜综合医院的顾问医生来为傅树介治疗。

顾问医生到达监狱医院后，建议将傅树介转送至樟宜综合医院。随后，傅树介又被转送至陈笃生医院照 X 光，以作更精确的检查。检查后，发现傅树介的鼻腔和前额受到一个巨大肿块的压迫，但却未能确定，所以就决定要求神经外科医生来为傅树介进行手术，且手术期将订于某个星期一进行。期间，傅树介一直住在空调的病房，从而导致傅树介在预定的手术日前一两天，咳出一团粘液。由此，傅树介的病情就得到了确诊，那就是有一个粘液囊肿从傅树介的前额延伸到脸颊，而那团粘液就是说明它破了。因此，傅树介不必剖开头骨，仅须请来耳鼻喉科医生为傅树介进行非常严重的慢性鼻窦炎手术。

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到了第三天，当医生为傅树介“取出留在鼻腔内的止血包时，腔壁因受到囊肿扩大的持续压力而减弱时破裂了。因此，止血包与粘附着腔壁的一条动脉一起被取了出来，结果血液流不上大脑，傅树介晕了过去”（详见 Dr Poh Soo Kai Part 2, 2011），心脏也停止了跳动。这时，医生拼命地替傅树介做胸外心脏按压，使傅树介苏醒过来。最终，傅树介虽然复元了，但傅树介却因“视网膜缺乏氧气和眼眶形状的改变”（Dr Poh Soo Kai Part 2, 2011），成为了其日后的主要缺陷。

傅树介在医院住了大约三个月后，又再次收到延长拘留令，并同时
将傅树介带回惠特利路扣押中心养病，直至 1982 年 8 月 26 日释放。

第三节 重获自由身

历经 17 年的铁窗生活，傅树介终于重获自由之身，真正地摆脱牢狱之灾，但却被警告：“不能够批评任何人；不允许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来谈论其自身的案件和对其自身的指控；内安局将会以其名义发表一份声明。”（详见 Dr Poh Soo Kai Part 2, 2011）与此同时，傅树介的父母亲亦被警告说：“如果傅树介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他将会立即再度被捕。”（详见 Dr Poh Soo Kai Part 2, 2011）对于此警告，傅树介仅回答：“我是一个文明人，如果记者来敲我的门，我会邀请他们进来。你们最好是派人驻守在我的门外，把记者赶走。”（详见 Dr Poh Soo Kai Part 2, 2011）这一回答，毫无疑问显示出傅树介的大勇不惧，坚定不移的信念。因此，傅树介无视任何警告，勇往直前，毫无半分退缩地前进，犹如接受访谈、演讲、出版书籍、建立历史中心等。

根据傅树介所言，在他被释放后，曾有一位名为 D' Silva 的美联社记者探访过他。傅树介也很淡然地面对之，并毫无畏惧地向他述说出其自身所遭受到的限制和违反警告的后果。其后，傅树介还在上实龙岗路（Upper Serangoon Road）开设私人诊所，当一名医生，直至 1990 年移居到加拿大的温哥华（Vancouver）。期间，傅树介还会经常返回新加坡与亲友相聚，特别是在加拿大的冬季。

数十年后，傅树介返回新加坡与家人同处于一个国家。自此，傅树介也开展了其色彩般的生活：2009 年，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星期天》的专访、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学术人员俱乐部发表演说、接受新加坡医药协会的专访；2010 年，与陈仁贵和许赓猷合编出版名为《〈华惹〉时

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一书、出席在檳城举行的《〈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新书推介礼；2011年，宣布在吉隆坡筹设“人民历史中心”（People’s History Centre / Pusat Sejarah Rakyat）、到访泗水的美达由亚贡（Medayu Agung）图书馆收集资料；2012年，在吉隆坡的 Pusat Rakyat Loyar Burok 演讲、为陈碧玲的《不熟悉的英雄》和赛·扎哈利的《赛胡先阿里——政治斗争回忆录》（Syed Husin Ali: Memoirs of a Political Struggle）主持新书推介礼、在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的林福寿悼念会上致词等；2013年，担任在新加坡举行的“一九六三年二·二大逮捕事件——五十年周年纪念”（We Remember: 50th Anniversary of Operation Cold Store 2. 2. 1963）演讲者、与陈国防和孔莉莎合编出版《新加坡 1963 年的冷藏行动——50 周年纪念》（The 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in Singapore: Commemorating 50 Years）、出席在新加坡的《新加坡 1963 年的冷藏行动——50 周年纪念》新书推介礼，并担任演讲者之一等。这种种活动，无论是演讲、专访、建立历史中心或出版书籍，皆让傅树介朝向一个目标，即揭露史实，让世人更为了解马新的政治历史和不为人知的一面。

结语

从傅树介诞生直至现今的历程来看，傅树介共经历了三场战斗，即反英殖民主义、对抗无理的扣留与挑战官方历史。在这三场战斗中，战场皆分别在其大学生涯、社会主义阵线的舞台；封锁翅膀的牢狱；重获自由之身的晚年生涯。首先，傅树介面临的第一场战斗，无论是在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抑或社会主义阵线，傅树介都毫无疑问地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并坚持将社会主义思想一灌到底。换言之，社会主义就是傅树介所向往的一个主义。根据其在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与社会主义阵线的一举一动而言，犹如在会刊《华惹》的发言、与林清祥等人一同创立社会主义阵线的目标等，皆可从中得知傅树介追求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一个反殖民主义、要求独立、民主、公民权利、平等、自由等，一切皆是为人民谋取更公平的待遇、福利等，非为一己之利。

对于这种种追求，傅树介不曾怠慢过，即使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傅树介依然不轻易放弃，始终如一地向往之，不会临时打退堂鼓，更重要的是，傅树介没有只限于空谈，而是更积极地以实际行动对待之，犹如《华惹》案件、与恶势力的对抗等。这些事件的经过，皆足以显示出，傅树介拥有着“毫无惧色，勇于奋战”的精神，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地在战场上，以行动、文字，乃至于话语来对抗英人和亲英者。由此可见，傅树介虽然身受英文教育，但他却不被此教育所束缚或盲目充当英人的鹰犬，而是透过其自身的思维和明亮的眼睛分辨事物的好与坏，再从而利用自己获得的知识，掌握的语言，领导众人，以期

通过种种活动来揭露一切的腐败和推动种种活动，可谓展现出傅树介身为一位英语领导者和旗手的独立思维与不受殖民主义所支配的特质。

其次，傅树介在第二场战斗，更是突出了其自身的特质。依本文第三章的第二节所述：“傅树介为了加入社会主义阵线，宁放弃富有前途的医生生涯和到英国妇产科培训的奖学金”，但这些牺牲非属全貌。就以傅树介在李光耀的深文周纳之下，不仅失去了自由之翼，还牺牲甚多，犹如亲情、青春、岁月的流逝等。除了牺牲之外，傅树介还遭受到不一般的对待，如单独监禁傅树介，让其遭受精神上的折磨；政府部人员以带有一些威胁性的形式，逮捕傅树介爱妻 Grace Poh，逼迫傅树介作出声明等。面对如此困境，傅树介却依然不接受有条件的释放，仍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屈服于恶势力的脚下。

常言道：“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自傅树介被扣上帽子，踏入铁窗生活的起跑点上，就开始作出了其牺牲与失去自由、亲情、青春等，那傅树介所作出的这些牺牲，以至献出其十七载的精华岁月，又换来了什么呢？就前文所述，傅树介两度入狱，被扣留了长达十七年，亦与世隔绝了十七年，但傅树介并不是一无所获，至少傅树介在里头体验到外界人士所无法体会、无法知晓的真实历史、黑暗的一面、扣留者的遭遇和生活环境。这些都是值得世人所探讨和追究的历史，同时也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环。

最后，傅树介自加拿大返回新加坡后，分别扮演着揭露者和历史见证者的角色，勇敢地挑战官方历史，以期让世人更为接近历史的真相与发掘不为人知的人事物。因此，傅树介不断地在马新两地给予演讲与接

受访问，述说其自身的学生生涯、《华惹》案件、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在牢狱的艰辛生活等。另，傅树介还与旧日战友在马来西亚出版他们自己撰写的书籍，名为《〈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和《新加坡 1963 年的冷藏行动——50 周年纪念》，是填补历史空白的政治历史书籍。与此同时，亦是本有别于官方历史的政治历史书籍，而两者的分别就在于：官方历史由当权者所支配，对某些历史事迹会有所隐瞒或扭曲；而以傅树介等人撰写的《〈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和《新加坡 1963 年的冷藏行动——50 周年纪念》，则将历史的另一面呈献出来，犹如评述了当时的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华惹》案件、“冷藏行动”、反殖运动、独立运动等 1950、60 年代的马新政治风云，实是写出另一番风味。

除了给予演讲、接受访问和出版书籍外，傅树介亦与赛·扎哈利计划在吉隆坡一起筹设“人民历史中心”，以期将马新两地人民为争取独立而反英殖民的记录、资料、文献集于“人民历史中心”，因为傅树介认为“有关这方面的历史，长久以来过多的集中于两地精英人物的活动与角色”（傅树介，2011），所以傅树介决定与赛·扎哈利一同设立“人民历史中心”，“强调被忽略了普通人民，——学生、木屋居民、农民、渔民、工人等的角色。”（傅树介，2011）毫无疑问，这一项艰巨的任务，唯有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傅树介和其一代人才能够完全胜任，而且这也同时被视为傅树介的贡献之一。除此之外，傅树介亦在这一场战斗里，即第三场战斗，更为突出了其自身的历史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傅树介被捕入狱这么久，仍存有其重要地位的原因。

在这三场战斗里，傅树介最后是以一个悲剧人物终结。虽然如此，但傅树介的种种经历，都能够警惕世人，而且他的精神，亦值得世人所学习。就犹如傅树介即使面对一浪接一浪的阻碍或因李光耀的策划，而被捕入狱，并因此而局限于合并的斗争声中，不能再为理想奋斗，成为1950、60年代马新政治史上的失败者和李光耀的牺牲品，但傅树介仍然不委曲求全，不放弃其自身的政治理想，反倒是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和更为肯定其自身的政治理想是不可或缺的。就此，傅树介似乎表现出近似于其外公，即陈嘉庚的精神：一、傅树介持有社会主义思想，而且不轻易放弃；二、面临莫须有的罪名，而承受牢狱之灾的时刻，傅树介不曾向恶势力低头或卑颜屈膝，从而充分显现出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与民族气节；三、傅树介不为过去的牺牲而后悔，仍勇往直前。就以上种种而言，不难看出傅树介是一位经得起在政治上兴衰成败的考验之人。

参考书目

一、 专书

(一) 中文书籍

陈碧笙、陈毅明（1986），《陈嘉庚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陈天绶、蔡春龙（2005），《陈嘉庚之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冯玮（2008），《日本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辜瑞荣（1999），《内安法令（ISA）四十年》，吉隆坡：朝花企业出版社。

韩山元（2006），《新马史话一千年》，八方文化创作室。

李光耀（1998），《李光耀回忆录 1923-1965》，新加坡：新加坡联合早报。

林远辉、张应龙（2008），《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鲁虎（2004），《新加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罗兆强（2010），《白色风暴——新加坡的新仇旧怨》，香港：德艺出版社。

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年—1972年）》，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

南岛丛书编辑委员会（2000），《马来亚风云七十年》，香港：南岛出版社。

吴静明（2010），《走不到终点的人》，吉隆坡：Polar Vista Sdn. Bhd.

依田熹家（1995），《日本通史》，台北市：扬智文化。

张青（2004），《新加坡：创造经济奇迹》，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张泰永（2010），《〈华惹〉风云与后李光耀时代》，吉隆坡：21 世纪出版社。

T. N. Harper（2004），《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八打灵再也：策略资讯研究中心与朝花企业。

（二）英文书籍

Dennis Bloodworth. (2005). *The Tiger and the Trojan Horse*.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 Marshall Cavendish.

Jeyaraj Rajarao. (2010). The legacy of the Socialist Club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nfluences and reminiscences. In Poh, S. K., Tan, J. Q., & Koh, K. Y. (Eds.), *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 (pp. 21-91). Petaling Jaya, Malaysi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Lau, A. (1998). *A Moment of Anguish: Singapore in Malays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engagement*.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Lee, K. Y. (1961). *The Battle For Merger*.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ang, C. L. (1971). *Singapore's People's Action Party: Its History,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h, S. K. (2010a). The future as history. In Poh, S. K., Tan, J. Q., & Koh, K. Y. (Eds.), *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 (pp. 299-310). Petaling Jaya, Malaysi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Poh, S. K. (2010b). Genesis of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In Poh, S. K., Tan, J. Q., & Koh, K. Y. (Eds.), *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 (pp. 11-20). Petaling Jaya, Malaysi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Poh, S. K. (2010c). Detention in Operation Cold Store: A Study in Imperialism. In Poh, S. K., Tan, J. Q., & Koh, K. Y. (Eds.), *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 (pp. 155-220). Petaling Jaya, Malaysi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Poh, S. K. (2011). Together, in Service to Our People. In Tan, P. L. (Ed.), *An uncommon hero: M. K. Rajakumar in politics and medicine* (pp.72-76). Petaling Jaya, Malaysi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Tan, J. Q. (2001). Lim Chin Siong – A Political Life. In Tan, J. Q., & Jomo, K. S. (Eds.), *Comet in our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 (pp. 56-97). Petaling Jaya: Insan.
- Tan, J. Q., Poh, S. K., & Koh, K. Y. (2010). Introduction. In Poh, S. K., Tan, J. Q., & Koh, K. Y. (Eds.), *The Fajar generatio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Malaya and Singapore* (pp. 1-10). Petaling Jaya, Malaysi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Tan, P. L. (2011). *An uncommon hero: M. K. Rajakumar in politics and medicine*. Petaling Jaya, Malaysi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Yap, S., & Leong, W. K. (2009). Lawyer: Lee Kuan Yew. Fee: \$10. In Yap, S., Lim, R., & Leong, W. K. (Eds.), *Men in White: The Untold Story of Singapore's Ruling Political Party* (pp. 27-42).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二、 报刊

（一） 中文报刊

林钦，〈从政治观点看教育·检讨委员会报告书〉，《火焰报》第 4 期，1960 年 11 月。

〈马大七学生被控·出版煽动刊物〉，《星洲日报》第 5 版，1954 年 5 月 29 日。

〈马大生首次政治性活动·组社会主义者俱乐部·事前曾获正副校长批准·始在其指导下起草章程〉，《星洲日报》第 6 版，1953 年 2 月 24 日。

（二） 英文报刊

Barisan Socialis is registered. (1961, August 14). *The Straits Times*.

Dr. Poh: Why I parted company with PAP. (2009, December 27). *Sunday Times*.

Lee, A. C. (1953). A criticism of the socialist club. *Fajar*, 4.

Who's who in the big round-up: count shows Barisan suffered the heaviest casualties. (1963, February 6). *The Straits Times*.

三、网络资料

(一) 中文网络

傅树介 (2011), 〈收集新马抗英独立史料·筹设人民历史中心基金〉, 2011年11月22日阅自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_v2.php?n=18418。

刘惠生 (2010), 〈陈嘉庚家族初考〉, 2012年6月22日阅自 <http://www.tankahkee.cn/detail.aspx?newsid=226>。

(二) 英文网络

Dr Poh Soo Kai and MHA's fiction of his involvement with the injured bomber (Part 1). (2011). Retrieved November 21, 2011, from <http://fn8org.wordpress.com/2011/10/03/dr-poh-soo-kai-and-mhas-fiction-of-his-involvement-with-the-injured-bomber-part-1/>

Dr Poh Soo Kai (Part 2). (2011). Retrieved November 21, 2011, from <http://fn8org.wordpress.com/2011/10/07/dr-poh-soo-kai-part-2/>

Report of 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Singapore: 30 November to 5 December 1978. (1980). Retrieved April 22, 2013, from <http://www.amnesty.org/fr/library/asset/ASA36/010/1979/en/6c93e2fb-ea58-4899-aba0-ba657f8e43b8/asa360101979en.pdf>

Singaporean national referendum, 1962. (2012). Retrieved November 22, 2012,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ngaporean_national_referendum,_1962

四、电子书

Loh, K. S., Edgar, L., Lim, C. T., & Seng, G. Q. (2012).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and the Contest for Malaya: Tangled Strands of Modernit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July 2, 2012.

五、访谈

傅树介（2012年2月8日），“由童年直至现今的经历”。（伍雪仪[访问人]）

附图一：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党徽



资料来源：http://southeast-asia.jbdirectory.com/images/0/06/Barisan_Sosialis_logo_ekk.jpg